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63期(民國98年3月)·1-4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蘇州的東洋貨與市民生活(1736-1795)*

賴惠敏**

摘 要

^{*} 本文是參加李孝悌教授主持中央研究院主題計畫「明清的城市文化與生活」的成果之一。寫作中曾蒙朱德蘭教授、巫仁恕教授、劉序楓教授提供相關研究資訊,以及王振忠教授提供妝譜及圖片,陳慧霞教授提供日本漆器製作之研究,謹此致謝!筆者於2007年11月10日在京都大學參加「中日近世城市生活」國際研討會,與會學者平田昌司教授談及二次大戰日本兵的家書寫著:「中國偏遠的山區村落藏有日本的銅器,不知其由來。」以這篇文章來探索清代中日交流,或許有些意義吧!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給予寶貴意見,以及計畫助理許富翔同學諸多協助。

收稿日期:2008年10月7日,通過刊登日期:2008年12月15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代表日本漆器風格的名詞。而從蘇州冬季毛皮服飾充斥市面,以及市民慣用日本進口的保暖設備,亦可推見滿族文化的影響。要言之,本文認為,十八世紀蘇州市民在飲食習性、日用器具、社會風尚與習俗等方面的生活習慣,由於消費東洋貨而產生了變化,甚至與日本有些相似,從中也可見及滿清宮廷文化推展至民間的方式,以及市民對之加以模仿的趨勢。

關鍵詞:蘇州、東洋貨、銅、蒔繪、文化認同

一、前 言

近年來,我探討十八世紀的中國城市時,特別留意中外貿易對市民生活的影響。¹然而,閱讀蘇州的檔案和碑刻資料,感覺困惑的是蘇州不產金銀銅鐵等金屬,而製作飛金、銅器、洒金箋紙的行業特別多,究竟金屬來自何處?最近,我閱讀中日貿易有關「洋銅」、「銅器」的記載,對金屬的來源較爲瞭解,因此本文擬討論蘇州東洋貨與市民生活。

關於十八世紀的中日貿易有許多日本學者研究過,山脇悌二郎《長崎の唐人貿易》、任鴻章《近世日本と日中貿易》、松浦章《清代海外貿易史の研究》對日本相關研究已做詳細的討論。²台灣學者劉序楓探討過日本進口的洋銅,他統計自康熙 23 年(1684)清朝開放海禁後,日本銅輸出至中國的數量急遽增加。康熙 23 年至 34 年(1684-1695)間,每年均有 300-400 萬斤;康熙 35 年至49 年(1696-1710)間,每年均有 400-700 萬斤。康熙 54 年(1715)以後因日本銅產減少,至乾隆 7 年(1742)日本將輸出銅數限制在 150 萬斤;乾隆 30 年(1765)

¹ 參見拙作,〈清乾隆朝內務府的皮貨買賣與京城時尚〉,《故宮學術季刊》,卷 21 期 1(2003), 頁 101-134;〈寡人好貨:乾隆帝與姑蘇繁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50 (2005 年 12 月),頁 185-233;〈北京的洋貨與旗人日常生活(1736-179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主辦「從城市看中國的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2007 年 6 月 28 日(出版中)。

² 山脇悌二郎,《長崎の唐人貿易》(東京:吉川弘文館,1960);任鴻章,《近世日本と日中貿易》(東京:六興出版,1988);松浦章,《清代海外貿易史の研究》(京都:朋友書店,2002),頁159-160。

爲 130 萬斤;乾隆 56 年(1791)降爲 100 萬斤。³

劉序楓認爲:「從海產品到日常生活用品,都可以在乍浦街上看到。又透過牙行及商人之手,再流入江南的流通與消費中心蘇州。」⁴永積洋子所編《唐船輸出入品数量一覧》記載 1637-1833 年間,中國船到日本購買的銅器、漆器等雜貨,但該書有些年代沒有清楚註明銅器和漆器的數量和款式。⁵幸而,《乾隆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記錄了幾位居住蘇州地區的官員,在他們被查抄家產的清單上,光是銅器和洋漆即多達數千多件。⁶之後這些器物又被解運北京,至今北京的故宮博物院和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都藏有洋漆器;數年前,兩岸故宮博物院展覽日本文物,出版《故宮藏日本文物展覽圖錄》、《清宮蒔繪:院藏日本漆器特展》,皆收錄有日本漆器圖錄。⁷另外,從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數位典藏計畫,也可找到洋漆器和銅器的收藏,這些皆有利於對器物的風格進行瞭解。

西方學者 Norbert Elias 提到十八世紀法國宮廷對社會的影響,他認為:「法國社會整個結構和發展,逐步使越來越多的階層渴望效仿上流社會的模式。」不僅僅是指就餐形式,也包括思維和談吐的方式。⁸巫仁恕研究晚明士大夫的消費文化,特別重視鑑賞的品味,認為其具有社會區分的作用,並以「雅」、

³ 劉序楓,〈清康熙——乾隆年間洋銅的進口與流通問題〉,收入湯熙勇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9),第7輯,上冊,頁93-144。

⁴ 劉序楓,〈清日貿易の洋銅商について――乾隆~咸豊期の官商・民商を中心に――〉,《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號 15(1986),頁 107-152;〈清代的乍浦港與中日貿易〉,收入張彬村、劉石吉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3),第5輯,頁187-244;〈財稅與貿易:日本「鎖國」期間中日商品交易之展開〉,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組編,《財政與近代歷史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頁275-318。

永積洋子編,《唐船輸出入品数量一覧,1637-1833年:復元唐船貨物改帳,帰帆荷物買渡帳》 (東京:創文社,1987)。

^{6 〈}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 懲辦貪污檔案選編》(北京:中華書局,1994),冊 1-4。

⁷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藏日本文物展覽圖錄》(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陳慧霞,《清宮蒔繪:院藏日本漆器特展》(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2)。

⁸ 諾貝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著,王佩莉譯,《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局,1998),卷1,頁187-198。

「俗」作爲士人與庶民之間的區分。⁹本文則針對市民來討論消費文化,因洋貨不像屋宇、服飾爲朝廷界定貴賤等第的範疇,仕宦與商賈皆能消費日本的洋貨;再者,更大量的海產品也直接影響到城市居民的飲食習慣。內容上,將從貿易和消費兩方面來討論,有關貿易的問題已有許多學者做研究,本文再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現存清代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乾隆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找到新的洋商資料,作一點補充。¹⁰另外,本文由清代官宦的抄家檔、文集和食譜來討論蘇州的市民對東洋貨的消費,而在消費過程中,蘇州市民文化似乎展現對統治文化認同的趨勢,因此本文亦試圖就日本商品在江南的消費情形作進一步的闡述。

二、奇贏生計屬洋商

《吳縣志》載:「西城者貿易多而治產少,好華美而羞儉嗇。閶胥之間, 百貨叢集」、「南濠則川廣海外之貨萃焉」、¹¹「貨集南濠上下塘,囂聲午市 聚金閶。」¹²蘇州市面充斥海外洋貨,來自洋銅商與官賈之參與。

(一)蘇州的洋銅商

《水窗春囈》提到:與河廳「同時奢靡者,爲廣東之洋商,漢口、揚州之鹽商,蘇州之銅商,江蘇之州縣,其揮霍大半與河廳相上下。」¹³蘇州銅商致富的原因是康熙年間爲了募集鑄造銅錢之材料,鼓勵商民出洋辦銅。康熙 60年(1721),江蘇浙江總辦採購洋銅,江蘇獨承認五省(江蘇、安徽、江西、浙

巫仁恕,《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頁 219。

¹⁰ 史語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現存清代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台北: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藏)(以下簡稱〈明清檔案〉);〈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北京:中國第一歷 史檔案館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冊 1-4。

¹¹ 吳秀之等修,《吳縣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據民國 22 年鉛字本影印,1970),卷 52 上,頁 86。

¹² 袁學瀾輯,《姑蘇竹枝詞及續》,收入《中國風土志叢刊》(揚州:廣陵書社據清香溪草堂《適園叢稿》本影印,2003),冊43,卷5,頁69。

¹³ 歐陽兆熊、金安清撰,《水窗春囈》(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下,頁42。

江、福建)銅數,皆先發帑錢交商船出洋採買。¹⁴《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據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二日,會考府具奏來文內中開:銅商范毓馪等五房,每年給銀十七萬五千二百兩,其內現催獲一萬一千八百兩,以抵伊等虧空之項交內庫外,未交銀十六萬五千四百兩。」¹⁵可見山西商人范毓馪爲重要銅商之一。

然日本正德 5 年(1715),實行正德新例,規定清貿易船每年 30 艘、銅的 貿易額限定 300 萬斤。由雍正年間《明清檔案》記載可知,日本每年產銅不到 三百萬觔,而日本發給執照的中國船隻有 80 多艘,每年只有 30 餘艘船可以到 日本採購洋銅。每艘船得銅 800 餘箱,一年進銅量爲二百數十萬觔。(參見圖 1) 福建、江西等省官員到蘇州買就倭照,招商發價,但往往等上半年船隻未出洋。如雍正 10 年(1732)福建總督郝玉麟提出洋船出洋回棹約需二十餘月,福建有 8 位道府大員辦理運銅觔之事,在蘇州守候洋船回棹,延誤公事,故而請求變通辦買洋銅事宜。¹⁶

《吾妻鏡補》載:「自康熙六十年間定例,於蘇州立官民兩局。重領帑銀以採銅者曰官局;重以己財貨物易銅而轉售寶蘇局,以資鼓鑄者曰民局。」¹⁷ 乾隆年間由官、民商經營洋銅採辦。官商領政府的帑銀至日本採買銅觔;而民商則帶著貨物到日本換取銅觔。范毓馪於乾隆 8 年(1743)因欠內務府人參、木植銀兩共 1,141,250.29 兩,自 9 年(1744)起負責採辦洋銅抵補虧空,並分別解往各省接濟鼓鑄銅錢,輸送直隸、陝西走陸路,每百斤銅以 14 兩計算,江蘇、江西、湖北三省走水路,每百斤銅以 13 兩銷算。范毓馪至日本採購洋銅 130 萬斤,除交各省額數外,多餘者自行售賣。¹⁸乾隆 5 年(1740)起,官定價格每

¹⁴ 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獻通考》(台北:台灣商務書局據清光緒間浙江刊本縮印,1987),卷 14,頁4980。康熙54年分交各省承辦。

¹⁵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合肥:黃山書社,1998),上冊,頁 895-896。

 $^{^{1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1991), 冊 23,頁 482。

^{*} 翁廣平著,王寶平編,《吾妻鏡補:中国人による最初の日本通史》(京都:朋友書店,1997), 袋15,頁390-391。

^{18 〈}明清檔案〉,登錄號 024793-001,乾隆 9 年 1 月 29 日。

百斤銅為 14.5 兩銀,加上原先解送北京的水腳飯食銀 3 兩,共 17.5 兩,而蘇州城的市價每百斤市銅為平色銀 22 兩(等於庫平紋銀 19.8 兩)。官辦洋銅給價較低,然因官商置貨出洋交易,有貨物利潤可抵成本,不致於虧本。¹⁹至乾隆 11 年(1746),范氏家族因洋船未能按期回棹,議減額歲辦銅 80 萬觔,15 年(1750)再行議減歲辦銅 50 萬觔,分解各局。²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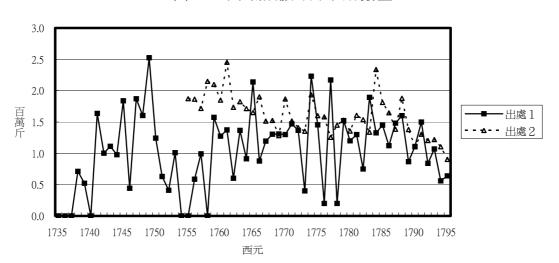


圖 1 中國船輸出日本銅數量

資料來源1:永積洋子,《唐船輸出入品数量一覧,1637-1833年》,頁257-298。

資料來源2:劉序楓,〈清代的乍浦港與中日貿易〉,收入《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5 輯,頁187-244。

范毓馪之子范清注、范清洪、姪子范清濟相繼參與洋銅運輸。乾隆 29 年 (1764)范清洪破產,次年,直隸總督方觀承疏稱:「候選員外郎范清濟,接辦銅觔。」乾隆 31 年(1766)范清濟奏稱:范家有洋船 6 隻,每年由日本長崎運洋銅 505,000 餘觔,范氏輸入的洋銅存在乍浦和蘇州的銅局。²¹乾降 48 年(1783)

-6-

^{19 〈}明清檔案〉,登錄號 023728-001,乾隆 5 年 4 月 16 日。

²⁰ 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獻通考》,卷 16,頁 5000。

²¹ 范清濟家產中銅局,站房、住房二所值銀六千餘兩。〈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冊 281,乾隆

范家洋銅船隻屢次遭風沉溺,虧損遽增,范清濟積欠內務府銀兩,內務府核定 范清濟之蘇州銅局,交新商王世榮辦運洋銅。王世榮經營銅務,資本不敷。52 年(1787)改由錢鳴萃辦理。

除官商外,蘇州還有民商採辦洋銅。松浦章討論乾隆年間民商辦銅有李豫來等 12 人。²²乾隆 20 年(1755),民商 12 人爲商額,每年發 12 船置貨出洋,每船約自備銅本銀 24,000 餘兩,辦銅 150 萬觔,仍照舊定官收一半之例。²³乾隆 25 年(1760),日本礦深出銅減少,銅價昂貴每百斤需銀 25.08 兩。戶部尚書官保等奏議:「官買十分之六,每百斤給價銀十七兩五錢,民買四分,以民買之餘潤補官價之不敷。」²⁴民商至日本買洋銅,官方給價每百斤 17.5 兩銀,與市價差了 7.58 兩,而洋銅只有 60%交給政府,其餘 40%能在市場銷售。乾隆 30 年民商購洋銅數降爲 80 萬斤。民商之一的楊裕和,除了辦銅官買之外,還代替舊商趙宸瞻欠銅本銀 127,000 兩,又代趙光謨 31,000 餘兩等。²⁵乾隆 37年(1772),錢鳴萃控楊裕和之子楊宏孚,搆夥欺隱洋銅數逾百萬餘觔。

(二)官員營運之洋貨

清代蘇州是手工業的重鎮,也是官員辦貢品的重要地點,因而官員亦參與 洋貨貿易。《乾隆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載,高積原籍福建,隨生母丁氏住蘇 州。高積之父高安爵在蘇州以營運起家,素稱富厚。高安爵去世後,高積分產 得三、四萬兩銀,自做洋船生理,在曹文侯洋行交易,家業漸富。乾隆 18 年 (1753),其洋船失風,貨物無歸。高氏收取資本,遵例捐官。至 21 年(1756) 由員外加捐道員,即停歇貿易,因此洋行帳簿只到 21 年以前買賣交易貨物。

³¹年6月6日。

²² 松浦章,《清代海外貿易史の研究》,頁 159-160。《清朝文獻通考》載:「乾隆二十年爲始, 增給布政司印照,以爲海口稽查符驗。其有他商情願辦銅者,悉附十二額商名下。」清高宗敕 撰,《清朝文獻通考》,卷 17,頁 5011。

²³ 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獻通考》,卷 17,頁 5010。

^{- 《}明清檔案》,登錄號 026235-001,乾隆 34 年 12 月 4 日。

²⁵ 根據劉序楓教授研究,趙宸瞻、趙光謨是雍正年間領官本赴日辦銅的商人,因未辦足額的銅數, 而造成積欠。劉序楓,〈清康熙——乾隆年間洋銅的進口與流通問題〉,收入湯熙勇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7輯,上冊,頁93-144。

後來他由江寧驛道升任貴州按察使,仍派人至蘇州經營生理。幫高積管事的戴紹文之子戴雲浦說:「高積在蘇時,向販洋貨生理,常在伊父紬緞店內置貨發洋。」另有高積的親戚魏懋、毛學禮,也做洋船生理,在乾隆 34 年(1769)以前已經歇業。²⁶

乾隆 34 年蘇州的米貴,高積命夥計帶貲本一萬餘兩至四川買米,至蘇州販賣。他遣人往開州等廠收買水銀 26,200 觔,照廠中時價每百斤四十餘兩,交外甥魏香雪同長隨王陞等赴蘇州發賣。在蘇州張姓行內,每擔得價九七色銀 68 兩,100 擔共得 6,800 兩。而 29 擔的水銀在貴州發賣,每擔僅得價九七色銀 51 兩。²⁷可見高積由商人轉爲仕宦,仍然從事長程貿易營運,獲利甚豐。高積家的什物寄放在閩客公建三山會館,寄存物件有銅、錫、瓷、木各器 4,237件。²⁸高積家產共查出銀 27,200 兩。江浙官員養廉俸銀多,他又在蘇州、乍浦各處營運,累積家產。

乾隆 46 年(1781)發生浙江杭嘉湖道王燧的貪污案件,王燧於蘇州投資,有 20,000 兩銀交給當鋪商人蔣餘生息,又如皋縣有生息銀 22,000 兩。²⁹乾隆 45 年(1780)皇帝南巡,王燧辦差,請友人王新盤在乍浦關採購洋貨。王燧供稱:「如綢緞、洋貨等物,遇賤置存,價貴轉售,每年獲利原有三、五千金不等。上年遇著差務需用之處甚多,也有就在本地銷售,也有發往別處變賣……。即如現在查出之器具物件(按:如羽毛呢緞、銅、瓷、玉器等),自己原用不著,許多這都是陸續購存,未及銷去的。」³⁰王燧的弟弟王炳在故鄉如皋經營京貨綢緞店 1 座,計房 17 間,置貨本銀 2,000 兩。³¹從《唐船輸出入品數量一覽》可知,乾隆 45 年的各種漆器、各種和紙、真鍮器物(黃銅器)、銅器物、香

²⁶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冊 1,頁 118-120。

^{4′ 〈}宮中硃批奏摺〉,財政類,庫儲(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發行微捲,1987),編號 0729-012, 乾隆 34 年 12 月 21 日;編號 0729-021,乾隆 35 年正月 19 日;編號 0729-032,乾隆 35 年 3 月 9 日。

²⁸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冊 1,頁 118。

²⁹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冊 3,頁 2105。

³⁰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冊3,頁214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冊3,頁2121-2123。

物數量比往年多。可見官員趁著皇帝南巡,競相進貢。

《故宮藏日本文物展覽圖錄》記載:「清代由於皇帝的喜愛,長期購買日本漆器,故而,形成了現有遺存。」不過,從〈內務府銀庫用項月摺檔〉中似乎看不到購買洋漆器的數量和用銀。³²陳慧霞討論康熙時江寧織造李煦進奉蒔繪、雍正時江寧織造隋赫德、蘇州巡撫高其倬、準泰都進貢日本蒔繪。³³《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記載,乾隆年間官員進貢的滿漢文檔案,貢品中不乏洋漆器物。另外,在〈養心殿造辦處收貯清冊〉中亦記載造辦處每年收貯的洋漆器物,將來擬另文討論。

此外,清宮漆器的另一來源是官員被查抄家產的器物。如王亶望被抄家時解京的漆器 420 件,有洋漆洒金盒、描金黑漆炕桌、描金黑漆炕櫥、炕几、金花硯匣、描金黑洋漆文具、洋漆洒金梳妝台、黑漆描金香盒等。陳輝祖被抄家解京洋漆器有 360 件,連他家的奴僕杜泰和張誠都被查出洋漆器皿 8 件。³⁴皇帝斥責說:「陳輝祖在蘇州所置房屋、當鋪,不願回籍,竟安心欲在蘇州居住,即此一端。其忍棄祖父墳墓,貪戀繁華。不但欺君罔上,而且背本忘親。」³⁵他的祖籍湖南祁陽縣,父親陳大受曾任軍機大臣、直隸總督,他依藉父親的庇蔭,當過兩江總督、浙江巡撫。陳輝祖在蘇州置產,享受繁華生活,而且在吳江縣黎里鎭開當鋪,又交給商人黃學乾營運銀兩共本利銀 7 萬兩;另並由王懋修領銀 3 萬兩營運生息。³⁶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清代日本漆器,根據其製作工藝,分爲描金漆(日本稱 作蒔繪)、彩繪漆、螺甸漆等。其中描金漆爲日本漆工藝中最高成就。描金漆

^{32 〈}內務府銀庫用項月摺檔〉(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宮採辦器物載於月摺檔,譬如,乾隆 22 年採辦自鳴鐘價銀 3 萬兩。

³³ 陳慧霞、〈清宮舊藏日本蒔繪的若干問題——以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收藏爲中心〉、《故宮學術季刊》, 卷 20 期 4(2003),頁 191-22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冊2,頁1818-1820;冊3,頁2803、2830。此外,還有浦霖家產中有洋漆等140件;錢受椿家產的洋漆器皿等391件,見冊4,頁3495、3565。

³⁵ 覺羅勒德洪等奉敕修,《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1167,頁 645-1~2。

³⁶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冊 3,頁 2564。

多數以黑漆,少數用洒金漆或紅漆爲底再用金,少數加銀或彩漆來描繪千變萬化的花紋。飾金方法有平描、凸起、暈染等,日本將它們分爲平蒔繪、高蒔繪、研出蒔繪、內合蒔繪、錆上高蒔繪等。³⁷《吾妻鏡補》作者翁廣平爲吳江縣人,成書於嘉慶 19 年(1814),該書載:「嵌螺鈿其花文如隆起,實則平如鏡也。」³⁸此外,由日本輸入的螺鈿漆器也相當精巧,乾隆 46 年王亶望抄家物品有螺甸漆器皿 155 件,包括螺甸炕桌、杯盤、碗筷、奶茶壺、攢盒等。³⁹可見鑲崁貝殼的螺甸漆器也是受歡迎的漆器。

《吾妻鏡補》載:「河波出銅」、「銅器尊罍彝鼎之屬多仿古鑄,且有奇異之形,足下有魚網文而無款識。」⁴⁰日本製作的仿古銅器,確有奇異形狀者。日本做的銅器,有款識的喜歡用語助詞,如「某年月日某人刻之也」,故要辨識日本做的銅器似乎不難。日本仿古銅器或蘇州打造的仿日銅器爲官宦之家大量收藏,汪圻原籍江蘇吳縣,家產包括在高郵州的通大號錢店、發祥號銅錫器店,有銅錫器 808 件。⁴¹

總之,蘇州的仕宦有許多兼具商賈身分,或租船從事遠洋貿易;或在蘇州 開輔賣洋貨,以致蘇州地區東洋貨充斥。

三、蘇州市民的日本風尚

《姑蘇竹枝詞》載:「畫船羅綺競嬉春,魚米家鄉自遂身。聞說神仙十洲地,也傳風俗似吳人。」⁴²所謂十洲地指瀛洲即日本,其風俗與蘇州略同,是因日本進口大量海產、器物,使蘇州生活習慣與日本頗爲相似。

数宮博物院編,《故宮藏日本文物展覽圖錄》,頁 120。以黑漆為地,以金漆為紋。周身飾通景山水圖,平描的部份在日本稱為平蒔繪。凸起於平面的技法稱為高蒔繪。洒金地在日本稱為梨子地。山石局部份分別貼飾金片或銀片,見頁 141。

³⁸ 翁廣平著,王寶平編,《吾妻鏡補》,卷 16,頁 325。

³⁹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冊 2,頁 1820-1823。

⁴⁰ 翁廣平著,王寶平編,《吾妻鏡補》,卷16,頁303;323。

⁴¹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徽辦會污檔案選編》,冊 1, 頁 1028-1029。

⁴² 袁學瀾輯,《姑蘇竹枝詞及續》,收入《中國風土志叢刊》,冊 43,卷 4,頁 54。

(一)食品

1. 海參、鮑魚、魚翅

自日本進口的海產品主要有海參、鮑魚、魚翅。劉序楓認爲,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前期日本出口的商品以銅爲主,十八世紀中葉以後,輸入中國的海產品的比重增加。⁴³這些海產品輸入數量多達數萬斤,影響蘇州人的飲食習慣(參見圖 2、圖 3、圖 4)。《清稗類鈔》記載,蘇州有名的孫春陽店,舖中辦事分六房,曰南貨房,曰北貨房,曰海貨房,曰醃臘房,曰蜜餞房,曰蠟燭房。⁴⁴海貨房所賣爲海產品,袁枚(1716-1797)《隨園食單》的海鮮單說:「古八珍並無海鮮之說,今世俗尚之,不得不吾從眾,作海鮮單。」海鮮有燕窩、海參、魚翅、鰒魚(鮑魚)、淡菜、海蝘、烏魚蛋、江瑤柱、蠣黃 9 種。⁴⁵

《清稗類鈔》「食魚翅之豪舉」條載:「魚翅產閩粵而不多,大率來自日本。自明以來始爲珍品,宴客無之則客以爲慢。」⁴⁶來自日本的魚翅爲宴客佳餚,未烹煮魚翅被認爲怠慢。顧祿《桐橋倚棹錄》載三山館在虎丘,居民有婚喪宴會之事,多到此宴客。其菜譜和魚翅有關的有魚翅蟹粉、魚翅肉絲、清湯魚翅、燴魚翅、黃燜魚翅、拌魚翅、炒魚翅。⁴⁷朱彝尊(1629-1709)《食憲鴻秘》記載,「魚翅,治淨,煮。切不可單拆絲,須帶肉爲妙,亦不可太小。和頭雞鴨隨用,湯宜清不宜濃,宜酒漿不宜醬油。或魚翅拆絲,同肉、雞絲、酒釀、醬油拌用。」⁴⁸乾隆年間刊行的《調鼎集》,對魚翅的食材有更繁複的烹調方式。魚翅的料理是「魚翅撕塊,加醬油、酒、蔥汁同蟹肉炒。」魚翅加入蟹肉來增加鮮味。金鈎蝦「用熱水發透,批片配多筍片、磨菇、菜頭、豆粉作羹。

⁴³ 劉序楓,〈財稅與貿易:日本「鎖國」期間中日商品交易之展開〉,收入《財政與近代歷史論文集》,頁 275-318。

⁴⁴ 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冊5,頁2313。

⁴³ 袁枚著,王英中校點,《隨園食單》(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頁15。

⁴⁶ 徐珂,《清稗類鈔》,冊7,頁3300。

⁴⁷ 顧祿撰,王稼句點校,《桐橋倚棹錄》,收入《蘇州文獻叢鈔初編》(蘇州:古吳軒出版社, 2005),下冊,卷10,頁658。

⁴⁸ 朱彝尊撰,邱龐同注釋,《食憲鴻秘》(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85),頁 160-161。

又,配閉甕芥菜作羹同。」或「對開配豬肉片煨」、「發透切絲,配筍乾絲、醬油、麻油、醋拌。」「燕窩襯菜」則加上雞鴨火腿、核桃仁、磨菇、香蕈絲等材料提味。"總之,平淡無味的魚翅、燕窩透過繁複的烹飪技術,和大量的配料等,變成了佳餚。

袁枚對海參、燕窩的評價是「庸陋之人也,全無性情,寄人籬下。」又說:「嘗見某太守宴客,大往如缸臼,煮燕窩四兩,絲毫無味,人爭誇之。」海參、燕窩必須依靠其他食材來提味,本身無味道。袁枚提到蔣侍郎家用豆腐皮、雞腿、磨菇煨海參。而魚翅則必須用好火腿、好雞湯,如鮮筍、冰糖煨爛。或用雞湯串細蘿蔔絲,拆碎鱗翅攙和其中。50如果不善烹飪,導致「海參觸鼻,魚翅跳盤」便成爲笑話。

關於海參類的食譜,《桐橋倚棹錄》載有:「燴海參、十景海參、蝴蝶海參、 炒海參、拌海參。⁵¹《食憲鴻秘》記載,海參則有糟食海參或拌醬炙肉末。」²²干 貝在宋朝以來稱爲「江瑤柱」,李漁(1611-1679)《閒情偶寄》提到:「讀江瑤 柱未獲一嘗,爲入閩恨事。」⁵³《吾妻鏡補》載:「江瑤柱日本呼爲甘貝,從 前所產甚少,價極貴。今各島皆產,故雖屬上品,不能得價。暴以爲乾,每斤 值銀二錢左右。」⁵⁴可見到十八世紀中葉以後,日本江瑤柱產量大增,以致價 格下跌。

龔煒(1704-?)論吳俗,「飲饌,則席費千錢而不爲豐,長夜流湎而不知醉。」⁵⁵ 日本輸出的海鮮成爲官宦富賈追逐奢靡飲食風氣的來源。《姑蘇繁華圖》中酒店的招牌林立,樓上雅座觀看蘇州美景,吃飯喝茶使用各色細瓷,滿桌的珍饈,如海參、魚翅、銀魚、筍尖,怪不得席費千錢。錢泳(1759-1844)《履園叢話》

⁴⁹ 佚名,《調鼎集》(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86),頁 160-161。

⁵⁰ 袁枚著,王英中校點,《隨園食單》,頁 15-16。

⁵¹ 顧祿撰,王稼句點校,《桐橋倚棹錄》,收入《蘇州文獻叢鈔初編》,下冊,卷 10,頁 658。

⁵² 朱彝尊撰,邱龐同注釋,《食憲鴻秘》,頁 106-108。

⁵³ 李漁著、江巨榮、盧壽榮校注,《閒情偶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 286。

⁵⁴ 翁廣平著,王寶平編,《吾妻鏡補》,卷16,頁315。

提及,蘇州飲食則有山珍海錯、酒池肉林。士大夫在江寧之秦淮河、蘇州的虎 邱山塘、揚州天寧門外的平山堂,畫船簫鼓,殆無虛日。⁵⁶

巫仁恕認爲,文人高舉養生與尊生口號,批評官宦富商之家過份追求遠方珍品野味,殊不知食物可能含有劇毒,對人體有害。⁵⁷文人的飲食態度和官宦富商有別,但是大量的海產品輸入,民眾仍抱著先吃爲快的心理。松浦章認爲,江戶幕府輸出的銅量減產,而海產品的輸出量則增加。江浙地區爲當時中國人口的五分之一,日本海產品大部份在江浙地域及其近郊地區消費。⁵⁸在官員的抄家單中,也不乏海參、魚翅的記載。如汪圻抄家單上有燕窩 4.5 匣(重 20兩)、海參 4 觔、魚翅 6 塊、蝦米 1 觔。汪圻之子汪師曾名下有海參 1 觔、燕窩 2 兩等。⁵⁹

有趣的是,江南市民的飲食文化流行海產品,而乾隆六次下江南,御膳單不離雞鴨魚內,卻無山珍海味。如乾隆 30 年,總督尹繼善、蘇州織造普福等進膳,也不敢讓皇帝吃海鮮。⁶⁰從目前出版的乾隆朝《清宮御膳》檔案,看不到皇室吃海鮮的紀錄,此因滿洲源自關外,以食豬肉爲舊俗。⁶¹至光緒年間,據說皇帝喜歡吃海鮮,御膳房才開始煮海鮮,根據〈內務府廣儲司用款檔〉記載,光緒 20 年(1894)正月,御膳房預備海參、魚翅、玉筍等項的用銀共計有8,000 兩。⁶²

³⁶ 錢泳,《履園叢話》(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 7,頁 192-193。

⁵⁷ 巫仁恕,《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頁 291-296。

³⁸ 松浦章,《清代海外貿易史の研究》,頁 387。

⁵⁹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徽辦貪污檔案選編》,冊1,頁1150-117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宮御膳》(杭州:華寶齋書社,2001),冊1,頁 255-290。

⁶¹ 愛新覺羅瀛生,《老北京與滿族》(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頁 182。愛新覺羅瀛生提到 北京旗人喜歡肉類食品,他說「肉類食品分三類,一是關東貨,即關外所產的野味;二是牛羊 肉,靠口外供給,而且最重『西口大羊』,西口爲歸化城,今之呼和浩特;三是豬肉,全靠山 東人開的肉舖供應。至於南方名產(金華火腿、湖南臘肉等),老北京稱之爲南貨,人們不認 它,縱偶一嘗之以換口味,亦視爲『譜外』之物。」

^{62 〈}內務府廣儲司用款檔〉(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冊 1673,光緒 20 年正月。

圖 2 中國船輸出日本乾海參數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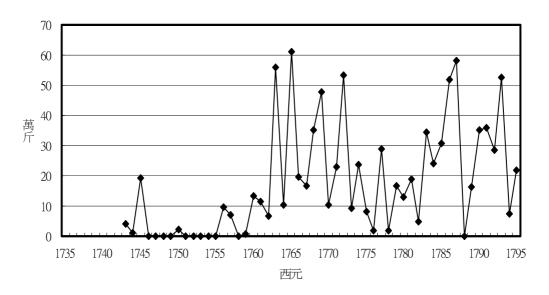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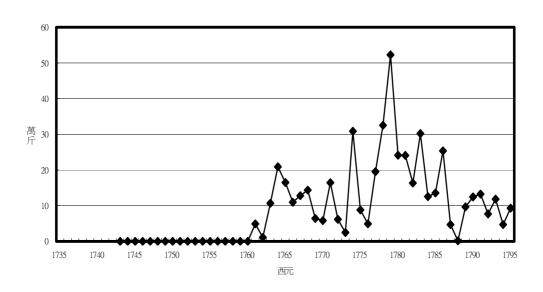


圖 3 中國船輸出日本乾鮑魚數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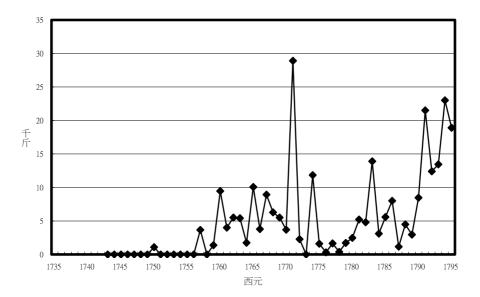


圖 4 中國船輸出日本魚翅數量

圖2-4資料來源:永積洋子,《唐船輸出入品数量一覧,1637-1833年》,頁257-298。

2. 海帶、瓊脂等

由日本輸入的海帶、魷魚、紅菜、雞腳菜、石花菜、瓊脂、目魚干、干魚 蝦貝、鹹魚等,算是價格低的海產品。不過,明代的文人認為海藻是大菜。陳 其元(1811-1881)引明代湛若水(1466-1510)的說法:「天下有貴物乃不如賤者。 只如眼前海菜,以紫菜爲貴。海藻次之,海藻所謂大菜也。苔爲下。紫菜爽口, 乃發百病,大菜病人可食。苔之好者,真勝前兩菜,且無渣滓,本草謂能消食 也。貴公子只是吃貴物。」⁶³在明代昂貴的紫菜,至清朝因輸入量大增動輒上 百萬斤,紫菜、海藻不貴(參見圖 5)。而以海參、魚翅等仍爲珍貴海產品。 陳其元《庸閒齋筆記》:「按紫菜此時並不貴重,而海藻則稍貴于紫菜,亦是 常物,非貴人所屑食者。今之海菜,則海參也,魚翅也,而推燕窩爲首,佳者價 至三四十金一觔,較紫菜價百倍矣。」⁶⁴海蜇皮也是廉價的海產品,「海蜇」的

^{随其元,《庸閒齋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89),卷11,頁281-282。}

⁶⁴ 陳其元,《庸閒齋筆記》,卷11,頁282。

做法是用嫩海蜇,甜酒浸之,頗有風味。其光者名爲白皮,作絲,酒醋同拌。⁶⁵

據《乍浦備志》載:「局商洋貨則由乍浦撥至蘇州,聽兩局商人議價發賣。惟海帶用解煤毒,酌派北路分消。若洋菜、海參、鮑魚等物隨處通消,不拘地分。」⁶⁶蘇州食譜中很少海帶的記載,而乾隆皇帝的御膳單〈乾隆四十八年正月膳底檔〉中常出現「炒雞絲燉海帶絲熱鍋一品」的菜單。⁶⁷海產品只見海帶一味,或許他相信海帶可以解煤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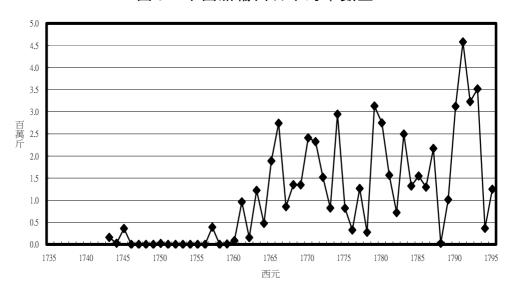


圖 5 中國船輸出日本海帶數量

資料來源:永積洋子,《唐船輸出入品数量一覧,1637-1833年》,頁257-298。

《廣東新語》載:「海菜其莓苔也,白者爲瓊枝,紅者爲草珊瑚。泡以沸 湯,沃以薑椒酒醋,味甚脆美。一名石花,以作海藻酒,治癭氣。以作琥珀糖,

-16-

⁶⁵ 袁枚著,王英中校點,《隨園食單》,頁76-77。

節,《乍浦備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 20》(上海:上海書店,1992), 卷6,頁 149。

^{67 〈}乾隆四十八年正月膳底檔〉,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檔案史料:圓明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頁 927、941、945、947、950、953、957。

去上焦浮熱。」⁶⁸石花菜浸久化成膠凍可以做琥珀糖。《隨園食單》提到「醬石花」,石花菜一名麒麟菜,將菜洗淨入醬中,臨吃時再洗。又「石花糕」的做法是將石花菜熬爛作膏,仍用刀劃開,色如密蠟。蘇州人喜歡吃甜食,許多食譜中提到蘇式清水蜜餞有玫瑰醬、清水山渣糕、清水甘草梅皮、橙糕等,形容爲甜食「色澤透明鮮紅」。⁶⁹清水蜜餞或許加了石花菜或寒天,才能像果凍般晶榮剔透。

約翰·巴羅(Sir John Barrow, 1764-1848)《我看乾隆盛世》(*Travels in China*, 1804)一書提到,中國人將海藻採集起來,再到淡水中浸泡,然後晾乾。將少許晾乾海帶葉放入水中煮,能使湯熬成膠狀。在其中加入少許糖、橘子汁或其他果汁,放在一旁冷卻,人們便可得到味道鮮美無比的膠狀高湯。⁷⁰圖 6 爲中國船輸入石花菜和雞腳菜的數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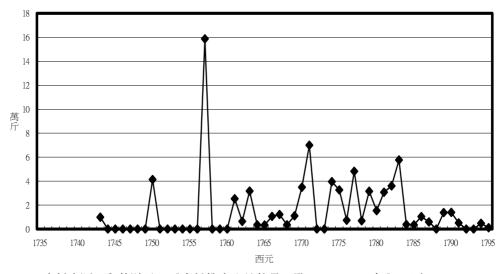


圖 6 中國船輸出日本雞腳菜與石花菜數量

資料來源:永積洋子,《唐船輸出入品数量一覧,1637-1833年》,頁257-298。

ob 屈大均,《廣東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 27,頁 720。

王稼句,《姑蘇食話》(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4),頁280。

⁷⁰ 約翰·巴羅著,李國慶、歐陽少春譯,《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 頁 411。

3. 醃製品

此外,自日本輸入的鹽漬品還有海燕、蝦醬、唎黃醬,價廉,爲貧家佐餐菜餚。《吾妻鏡補》載:「海鰻魚暴爲乾或以火炙,俗名木魚海燕。長僅一、二分,味甚鮮美,以爲燕所食故名。或做海醃,以鹽漬故也。蝦最小者漬之爲醬。介屬頗多,味亦尋常。最多者爲唎黃,可清爲醬,貧家俱製焉,以價廉也。」⁷¹日人青木正兒《中國醃菜譜》提及,春天到常熟旅行,看到賣醃菜和故鄉的糟漬一樣,撲鼻而來。他到店家要了醃菜和酒,堂信給他一碗切好的醃菜,上邊撒滿白色的東西,同富士山山頂的雪一樣,說是糖。他二話不說把糖撥掉。可見江南人吃醃菜的做法可能類似,而吃法有異。蘇州稻香村所鬻爲糕餌及蜜餞花果,鹽漬園蔬諸食物,盛於蘇,蘇人呼曰青鹽店。⁷²蘇州特產的醬油、松蕈油是其他地方沒有的,或許和日本飲食用味噌、椎茸相似。日本醬油的原料爲黄豆和小麥,在伏天中經水煮熟發酵,然後加鹽水置缸中,與中國用黑豆製醬油的原料不同。⁷³

總之,永積洋子的書上記載日本進口的椎茸、醬油、酒粕漬、味噌、石花菜 等物,影響蘇州市民的生活品味。

(二)銅器

吳縣的〈風俗志〉記載,富貴之家多收藏古玩,名曰古董,或畫、或字、或器皿,尺幅寸縑,貴踰拱璧,一瓶一碗,珍若連城。⁷⁴高濂〈論宣銅倭銅爐瓶器皿〉記載:「倭人鑿銅細眼罩蓋薰爐,亦美。更有鏒金香盤,口面四旁坐以四獸,上用鑿花透空罩蓋,用燒印香,雅有幽致。又若酒銚、水罐、吸水小銅中丞、抹金銅提、盔鎧、腰刀、槍劍,五供養蓮花架,紫銅湯壺、小鈸、小

⁷¹ 翁廣平著,王寶平編,《吾妻鏡補》,卷 16,頁 316-317。

⁷² 青木正兒,《中國醃菜譜》,轉引自王稼句,《姑蘇食話》,頁 159-160;徐珂,《清稗類鈔》, 冊4,頁 1879。

¹³ 日治時期林宗祥到日本學做醬油,用小麥、黃豆發酵,店名芳泉醬油行。據林瑞星口述日本醬油原料與中國傳統用黑豆製作壺底油方式不同。賴惠敏訪問,〈林瑞星先生口述紀錄〉,2008年2月13日。

⁷⁴ 葉長揚、姜順蛟纂,乾隆《吳縣志》(乾隆 10 年刊本,蘇州圖書館藏),卷 24,頁 12。

塔、罐罩盒,檳榔盒、石灰罐、刮銹銅刡、海螺鼻銅鏡、銅鼓、供獻盤橐碟子、鑿花金錢、散花銀錢、鑿銀細花卷段、鑿金大小戒指,上嵌奇石,種種精妙,不能悉數。」⁷⁵明代士大夫欣賞的日本製造器皿,大致可分爲賞玩、日用、供器、武器等類。

高濂《遵生八箋》載,近有潘銅打爐,名假倭爐。潘銅鑿嵌金銀倭花樣式,到清代洋銅大量進口,其中民商貿易年額80萬斤的40%私自銷售,每年約有30餘萬斤的洋銅在蘇州生產銅器。陳宏謀提及:「廠銅、洋銅官收居大半,每年打造銅器,需銅無算。」⁷⁶因而蘇州銅作在乾隆年間「西城業銅者不下數千家,精粗巨細,日用之物無不具。」⁷⁷其中以王東文銅錫最爲著名。《江南省蘇州府街道開店總目》第十店有精造銅錫器皿的大盛號。⁷⁸可見江南文人賞玩的尊罍彝鼎仿古銅器,很可能是仿自日本進口的銅器。

1. 食物器皿

日本進口的銅器食物器皿方面:永積洋子《唐船輸出入品数量一覧》記載,乾隆年間輸往中國的日用銅器,以銅盥、銅鍋、銅火缽、銅風爐、銅茶道具、銅藥罐居多,與明代文人描述「倭銅」器物有別,可見清代進口的銅器皿更符合市民生活所需。⁷⁹《乾隆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記載銅錫製作的器皿:銅鍋、銅火鍋、紫銅盤、大小錫火鍋等。⁸⁰王亶望的家產有銅器 434 個。陳輝祖被抄家查出銅器共 347 件,銅器重量 547 觔,其長隨杜泰、張誠被查出銅器器皿101 件。郭德平家中銅錫器皿共 142 件。伍拉納查出家產有銅器 417 件。浦霖查出家產有銅器 71 件,重量 237 觔 8 兩。⁸¹這些銅器多數作爲日用器皿,成

⁷⁵ 高濂,《灣生八箋》(成都:巴蜀書社,1988),燕閑清賞箋上,頁453。

⁷⁶ 陳宏謀,〈申銅禁酌鼓鑄疏〉,收入賀長齡輯,《皇朝經世文編》(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 卷 53,戶政 28,頁 9-10。

⁷⁷ 習寓,乾隆《蘇州府志》,卷 12,頁 17,轉引自段本洛、張圻福,《蘇州手工業史》(蘇州: 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頁 104、143。

^{&#}x27;。 范金民編,《江南社會經濟研究(明清卷)》(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6),頁 1047。

⁷⁹ 永積洋子編,《唐船輸出入品数量一覧,1637-1833年》,頁25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冊1,頁1144-45。

⁸¹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降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冊2,頁1821;冊3,頁2431、2803-04、2830;

爲蘇州人的時尚。

蘇州人冬至前一夕俗稱「冬至夜」,一家團圓,有錢人家全雞全鴨、青魚蹄髈、冷盤熱炒應有盡有,席上用銅火鍋、紫銅盤、黃銅羹匙等。顧祿《清嘉錄》記載:「年夜祀先分歲,筵中皆用冰盆,或八,或十二,或十六,中央則置以銅錫之鍋,雜投食物於中,鑪而烹之,謂之暖鍋。」⁸²蘇州地區整個隆冬季節都用銅鍋、銅爐,喝酒用錫壺、錫葫蘆酒壺等。故蘇州有俗話說:「有銅鈿吃一夜,無銅鈿凍一夜」,《姑蘇竹枝詞》有「座供唐花赴室寬,圍爐轟飲不知寒」的詩句。⁸³

蘇州人素有品茗的風氣,用日本進口的銅風爐來煮茶,風爐狀似古鼎,有 三足,並飾古文或圖案。風爐上放銅銱子來燒開水,泡茶的道具用銅茶壺、銅 茶匙、白銅茶托盤等。銅火缽則是冬天用來取暖的烤火工具,通常還用銅火箸 撥火。

皇帝御膳單上,冬天常有熱鍋一品,在蘇州織造局成做皇帝御膳的器物有:銅火鍋、銀火鍋、銀火壺、銀蓋碗、銀小叉子、銀匙、綠玉奶茶碗等。⁸⁴滿洲人的習俗,每人皆備有一副碟筷刀叉,各自分食。王亶望家的餐具也有成套螺鈿飲食器具,包括螺鈿蓋碗 40 個、飯碗 48 個、螺鈿盃盤共有 5 副,每副盃 12 個、盤 12 個;螺鈿調羹連托 24 副 2 件、螺鈿茶杯 36 個。⁸⁵換句話說,王亶望在家大開宴席時,客人使用成套螺鈿的餐具。Norbert Elias 提到法國宮廷貴族和市民相互交往,宮廷社會與下層之間沒有截然的界線。隨著各階層富有程度和互相的聯繫增加,下層模仿宮廷社會日益迫切。宮廷社會中逐步發展為每一樣食物都有特定的餐具。用於喝湯的匙,吃魚的刀和切肉的刀一起放在

冊4,頁3481-3495。

⁸² **顧祿**,《清嘉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 12,頁 180。

⁸³ 袁學瀾輯,《姑蘇竹枝詞及續》,收入《中國風土志叢刊》,冊 43,卷 5,頁 93。

^{84 《}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發行微捲,2000),微捲第 117 盒,乾隆 32 年 12 月金玉作、第 123 盒,乾隆 35 年 12 月匣作、第 151 盒,乾隆 56 年 4 月記事錄。 關於皇室所使用的餐具,另見〈內務府現行則例〉(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抄本),掌儀司二。

⁸⁵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冊 2,頁 1820。

盤子的一邊,用於吃餐前點心的叉、用於吃肉和吃魚的叉放在一邊。盤子的前方放吃甜食的刀叉和匙。吃最後一道菜或水果的時候還會送來其他餐具。⁸⁶清朝官宦的物質消費方式,似乎有意效仿宮廷社會,展現出上流社會的文明。

清宮裡的早點還保留東北人的習慣,喝奶子要對茶,叫奶茶,皇帝進膳飲奶茶,節慶宴請文武百官時亦賞賜奶茶一盂。江南也有喝奶茶習慣,郭忠豪研究江南食品,認爲明清時代江南的乳製品分佈地域,蘇州光福山、嘉興府澉浦、湖州府烏程縣、長興縣出產牛奶,製作乳酪、乳酥等。⁸⁷王亶望家藏有螺鈿奶壺,想必是裝奶茶用的,清人形容奶茶「溶之如湯,則白如餳,沃如沸雪,所謂奶茶也。」配上螺鈿茶杯,還有螺鈿攢盒裝各色糕餅、乳酪甜點等。⁸⁸從王亶望的居家陳設來看,必然宴客時網羅名人雅士,仿效宮廷社會爲流行時尚。

2. 書齋中的銅器

明清文人書齋中放置器物相當講究,仔細看看書房擺設,不乏東洋來的器物。文震亨(1585-1645)《長物志》提及:「於日坐几上置倭台几方大者一,上置爐一;香盒大者一,置生、熟香;小者二,置沉香、香餅之類。齋中夏月宜用瓷爐,冬月用銅爐。」⁸⁹上述的倭几上放置香盒,根據許雅惠的研究,晚明文人對古代的崇尙、古物市場的興盛,將鑑賞古銅器推向另一階段。江南人家日常生活中的仿古銅器,最爲流行者爲香具的鼎彝,其次是作爲花器的觚尊觶。⁹⁰銅器可插花者曰尊、罍、觚、壺,隨花大小用之。古銅漢方瓶、龍泉、均州瓶,有極大高二、三尺者,以插古梅最相稱。⁹¹陳輝祖的抄家單上有青綠銅百乳鼎、銅月尊、青綠銅雙環尊、銅絃紋花插等,都是花瓶類。

Norbert Elias 著,王佩莉譯,《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卷 1,頁 184-188。

⁸⁷ 郭忠豪,〈食物製作與品饌文化——萬曆~乾隆間江南的飲食生活〉(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4),頁 91-94。

⁸⁸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冊2,頁1820-1821。

⁸⁹ 文震亨著,海軍、田君注釋、《長物志圖說》(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卷7,頁418。

第 許雅惠,〈晚明的古銅知識與仿古銅器〉,《故宮文物月刊》,期 250(2004 年 1 月),頁 53-63。

⁹¹ 文震亨著,海軍、田君注釋,《長物志圖說》,卷 7,頁 340。

蘇州文人書房放置案桌上的銅器有琺瑯銅四方瓶、銅三喜鼎、銅花澆。牆上放置銅胎轎瓶,前面爲直頸球腹雲耳瓶,連接浮雕雲頭紋之座,靠牆面平,頸下方有一孔可以直接掛在牆面的釘上,故稱壁瓶,清檔中稱之轎瓶。此型器始見於明萬曆朝,清代盛行於乾隆時期。陳輝祖的家產單上有漢青綠銅罍、青綠銅變鳳卣、青綠銅周斝、漢青綠銅鐸、銅胎轎瓶,符合文人書房中的陳設。

晚明文人的文具,《長物志》舉出倭小花尊、倭小觶。⁹²書齋中燻衣炙手,少不了袖爐,以倭制漏空罩蓋漆鼓爲上。⁹³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的晚明錯金銀獸面紋角(圖7),在東京國立歷史博物館、長尾美術館藏有相似造型的商代銅角。又錯金銀雙羊角也同時藏在大英博物館和日本根津美術館(圖8)。《唐船輸出入品數量一覽》特別標出「古銅器物」、「銅器物」、「銅器」,⁹⁴說明十八世紀日本製造的仿古銅器銷往中國。



圖 7 明晚期錯金銀獸面紋角

資料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收入李玉珉主編,《古色:十六至十八世紀藝術的仿 古風》(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3),頁144。

文震亨著,海軍、田君注釋、《長物志圖說》,卷7,頁375。

⁹³ 文震亨著,海軍、田君注釋,《長物志圖說》,卷7,頁298。

⁹⁴ 永積洋子編, 《唐船輸出入品数量一覧, 1637-1833 年》, 頁 260-261。



圖 8 明至清初錯金銀雙羊尊

資料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收入李玉珉主編,《古色:十六至十八世紀藝術的仿古風》, 頁146。

3.婦女的妝盒

蘇州文人的〈嫁女詞〉描述:「玉滿奩,珠一斛。寶鈿金釵雜羅穀,席捲母家財,女心猶未足。昔人嫁女僅賣犬,今者幾至田宅典。」⁹⁵殷實人家的女兒出嫁時,父母準備許多陪嫁品,而若陪嫁品中有東洋貨,父母得花更多的經費,可能典當田宅。婦女的銅器嫁妝有銅火盆、銅手爐、銅腳爐、銅盤、銅鏡、琺瑯銅花瓶。⁹⁶銅手爐、銅腳爐、黃銅火盆係作爲冬天保暖之用,而蘇式手爐即以作工精巧,花色品種繁多爲人們所稱道(圖9)。其材質有紫銅、水紅銅、銀白銅、白銅、黃銅等。器型有圓形、長方形、橢圓形、六角形、八角形、瓜棱形、海棠形、龜背形等,絕大部份蓋上都刻有鏤空的花鳥或表示吉祥如意的各種圖案,有的還滿身刻花,底下或提柄處刻有作坊及人名款。

⁹⁵ 袁學瀾輯,《吳俗諷喻詩》,收入《中國風土志叢刊》(揚州:廣陵書社據清香溪草堂《適園 叢稿》本影印,2003),冊35,卷6,頁14。

⁹⁶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冊 2,頁 18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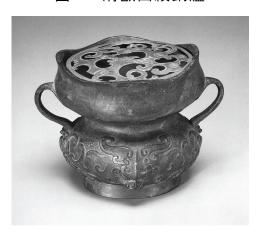


圖 9 清獸面紋銅爐

資料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收入李玉珉主編,《古色:十六至十八世紀藝術的仿 古風》,頁57。

清代宮廷婦女妝奩齊全,四阿哥福晉裝箱緞紬布疋銀,磁銅錫器皿。⁹⁷不 過清宮使用的餐具多爲銀器,銅器僅用在火盆,因此婦女銅製的妝奩數量也不 及漆器來得多樣。

4. 其他

蘇州救火的器械,起先是竹、木製成的「木龍」,後來逐漸改良用銅製的 先撳筒,稱爲廣龍。⁹⁸又蘇州歷史上出現過許多名醫,形成獨特的吳門醫派, 有「吳中醫學甲天下」之稱,閶門外山塘街一帶有規模大小不一的藥材行近百 家,多令煎膏業務十分興旺。⁹⁹中藥舖所用銅藥罐即來自日本,每年進口量有 數十箱。

(三)漆器

大陸學者王家範等認爲室居器用的消費稍大,鉅額的高消費用於追求雕

^{97 〈}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冊 229,乾隆 19年4月11日。

⁹⁸ 蔡利民,《蘇州民俗》(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頁 243。

華潤齡,《吳門醫派》(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4),頁 201-205。

琢、新奇的家具。¹⁰⁰明代士人家中使用倭箱、倭書櫃、倭几,《長物志》舉出倭漆墨匣、倭漆小梳匣、倭漆小撞。小撞即日本提漆盒。¹⁰¹明代的洋漆器大致上以文人書齋中賞玩器物居多,清代的洋漆器物更爲廣泛,從日常生活所需的食物器皿至書齋中賞玩的洋漆盒,乃至臥室中使用的炕櫃、炕桌、炕几,都可說明十八世紀日本外銷洋漆器的多樣性。根據約翰·巴羅的觀察:「日本在所有漆器和上光器具的製作上都勝過了中國,其製品在中國也都索價昂貴。」¹⁰²蘇州亦有漆作「有退光、明光,又剔紅、剔黑,彩漆皆精。皆旌德人爲之。」¹⁰³由旌德縣人成做的漆器,檔案中稱爲「蘇漆」,本文暫且不討論這問題。洋漆器物的用途廣泛,以下說明其用途:

1. 食物器皿

王燧做洋貨買賣,抄家單上有洋漆方長盤5個、洋漆茶盤2對、洋漆蓋碗10個、洋漆香盤5個。盛裝食品的洋漆果盒4個、洋漆檳榔盒10個、洋漆都〔多〕盛盤1個、洋漆有屜盤1個。蘇州地區出產各種果品,¹⁰⁴蘇州人喜歡在不同節令品嚐時鮮果品,使用洋漆果盒、洋漆多盛盤,在盤上放置各種果品,既美觀又可品嚐各種果品風味。

清宮也用多盛盤,如乾隆 36 年(1771)九江關務伊靈阿恭進八仙慶壽洋彩 多盛盤一對。¹⁰⁵伊靈阿負責九江關務兼御窯監督,成做多盛盤自然是應宮廷所

¹⁰⁰ 王家範、《明清江南消費風氣與消費結構描述——明清江南消費經濟探測之一》、《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 年第 2 期,頁 32-42;《明清江南消費性質與消費效果解析——明清江南消費經濟探測之二》,《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988 年第 2 期,頁 157-167。

¹⁰¹ 文震亨著,海軍、田君注釋,《長物志圖說》,卷7,頁375。

¹⁰² 約翰·巴羅著,李國慶、歐陽少春譯,《我看乾隆盛世》,頁 220。

¹⁰⁴ 吴秀之等修,《吳縣志》,卷 50,頁 849-851。如梅、海杏、樱桃、枇杷、楊梅、桃、山葡萄、林擒、柰、李、郁李、梨、木瓜、栗、榛果、棗、柿、烏椑、君遷子、銀杏、石榴、橘、真柑、金柑、柚、橙、香橼、山樝、桑葚、無花果、花生、胡頹子、黃獨子、芡實、蓮實、藕、葧臍

^{105 《}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微捲第 123 盒,乾隆 36 年 3 月 11 日記事錄。

需。清宮御膳中常出現「攢盤」,如蒸肥雞滷煮肉攢盤、清蒸鴨子奶酥油煤羊 羔攢盤(圖 10)。¹⁰⁶蘇州菜餚拼盤組合究竟是否受宮廷影響,還需要進一步 研究。



圖 10 黑漆描金山水紋扇形攢盒

資料來源:故宮博物院編,《故宮藏日本文物展覽圖錄》,頁137。

其次,洋漆檳榔盒可以說明清代人吃檳榔逐漸成爲風尚,陸以湉 (1802?-1865)《冷廬雜識》並云:「醫書檳榔治瘴,川廣皆喜食之,近則他處亦皆效尤。」¹⁰⁷

2. 書齋中的洋漆器

自明代以來,書齋用的洋漆器居多,而清代發展更多樣化。目前我們找到

的抄家檔案中有7,000件物品,其中有100餘件的洋漆和黑漆描金的器物。以書房的洋漆器來說,有洋漆金花硯匣、描金黑洋漆文具、洋漆筆筒、灑金洋漆手捲匣、洋漆書架、洋漆洒金書几、洋漆圍屏、洋漆火盆架、洋漆爐薰、洋漆盆景、洋漆痰盒、洋漆玻璃燈罩等。官員隨身攜帶物品如洋漆印盒、洋漆朝珠盒、洋漆檳榔盒等,項目琳瑯滿目。

清人放在書齋中的西洋鐘錶,這是明代士大夫書齋所缺乏的物品。清宮造辦處、廣州和蘇州曾改裝鐘錶外觀,有紫檀、洋漆等。譬如乾隆 41 年(1776)「太監胡世傑交一面玻璃螺甸添鐘架一座、萬壽山二面,玻璃螺甸漆刮去用舊胎股另漆黑漆畫金花,要仿洋漆做法,欽此。於十一月十九日將蘇州送到鐘架三座另漆見新呈進訖。」乾隆當太上皇也請蘇州織造製作洋漆格鐘架。¹⁰⁸「十二月初二日,做鐘處將應行補做乾清宮陳設洋漆格鐘一架燙樣,呈大學士伯和御前大臣福看閱。奉諭鐘穰一分著做鐘處成做,其五彩琺瑯表盤交粤海關監督常福照樣成做,洋漆格子交蘇州織造舒璽照樣成做,速爲趕辦,該二處俱務於明七、八月間交送京內造辦處,以備陳設,不可遲誤,特諭。於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將蘇州送到洋漆鐘格子一座呈進交做鐘處。」¹⁰⁹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仿日本黑漆地描金花的樓式鐘,鐘盤爲琺瑯質,上書「乾隆年製」。

《吾妻鏡補》載:「漆器,文几、古盒、硯箱三者其最尚也,盒子惟用菊花,稜圓者不用。」¹¹⁰坐几上放倭台几作爲放置器物架子,明清時代用三代秦漢鼎彝作爲香爐,皆備賞鑑。文人書齋中的文房四寶類有:「洋漆金花硯匣、洋漆筆筒、描金黑洋漆文具、描金洋漆文具。」¹¹¹洋漆香盒貯藏沉香或香餅,作爲鑑賞之物,亦用於焚香。清朝文人的書房放置洋漆都盛盤(圖 11),又稱「多盛盤」,貯放玉石、古玩,爲時興的擺設。從北京故宮博物院主要收藏

¹⁰⁸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冊 39,頁 491,乾隆 41 年 2 月行文。

^{109 《}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微捲第 154 盒,乾隆 62 年。

¹¹⁰ 翁廣平著,王寶平編,《吾妻鏡補》,卷16,頁330。

¹¹¹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黑漆描金山水紋六方筆筒等,參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藏日本文物展覽圖錄》,頁 125。

來看,有各種珍玩,如多寶櫥、多寶盒等。歐洲奇品收藏室的學者認爲中國多寶盒的收藏品,很可能來自歐洲。¹¹²到底多寶盒是源自中國、日本或者歐洲,可能還需進一步研究。



圖 11 清椿梅蒔繪方形小盒

資料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收入陳慧霞,《清宮蒔繪:院藏日本漆器特展》,頁32。

巫仁恕研究明代旅遊風氣興盛,文士發展出一套「遊具」,提盒、提爐、備具匣和酒尊四樣最爲重要。¹¹³《長物志》載有倭盒三子、五子者,即盒內嵌有三或五個小盒放置香餅之類。有倭撞金銀片者,撞即提盒,有蓋子分作一、兩層。¹¹⁴清代文人攜帶洋漆提盒、攢盒出遊,成爲時尚,兩岸故宮博物院皆藏有提盒。(圖 12)

¹¹² 賴毓芝,〈從康熙的算學到奧地利安布列斯堡收藏的一些思考〉,《故宮文物月刊》,期 276 (2006 年 3 月) ,頁 106-118。

¹¹³ 巫仁恕,《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頁 205。

¹¹⁴ 文震亨著,海軍、田君注釋,《長物志圖說》,卷7,頁 293-2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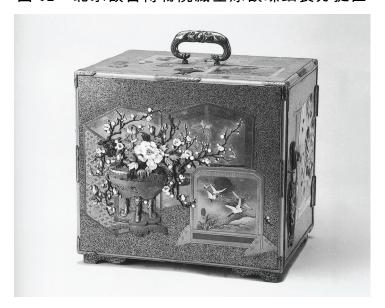


圖 12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金漆嵌螺鈿長方提匣

資料來源:故宮博物院編,《故宮藏日本文物展覽圖錄》,頁150。

3. 婦女妝奩中的洋漆器

巫仁恕研究晚明家具文化說:「江南城市中蘇州家具業的發展居於龍頭的 地位,引領著家具的流行風尚。」他研究明代嚴嵩被抄家時,有倭金彩畫大屏 風、倭金銀片大圍屏等,這些舶來品來自日本。嚴嵩家還有螺鈿、雕漆、彩漆 之類的床等,而徽州文書上的分家單則未見精緻的螺鈿、彩漆的家具。¹¹⁵

文震亨《長物志》云:「台几倭人所制,種類大小不一,俱極古雅精麗,有鍍金鑲四角者,有嵌金銀片者,有暗花者,價俱甚貴。」¹¹⁶高濂《遵生八牋》記載:「漆器惟倭稱最,而胎胚式製亦佳。如圓盒以三子小盒嵌內,至有五子盒,七子九子盒,而外圓寸半許,內子盒肖蓮子殼,蓋口描金,毫忽不苟。小盒等重三分,此何法制?方匣有四子匣,六子九子匣。箱有衣箱,文具替箱,有簪匣,有金邊紅漆三替撞盒,有灑金文台手箱、塗金妝彩屏風、描金粉匣、

¹¹³ 巫仁恕,《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頁 219、229-235。

¹¹⁶ 文震亨著,海軍、田君注釋,《長物志圖說》,卷7,頁272。

筆匣,貼金扇匣、灑金木銚角盥桶子罩盒,有罩蓋箱,罩蓋大小方匣。有書櫥之制,妙絕人間。」¹¹⁷從高濂和文震亨的書中,可看出從日本進口的用具有洋漆盒、多寶盒、文具箱、提盒,還有放置燻籠、衣架、盥匜、箱奩、書燈之類的器物。

然而,乾隆朝的蘇州所見的洋漆器種類更多,最主要是婦女妝奩的洋漆器皿增加。蘇州自明代以來,豪富之家厚嫁與競奢相爲表裡,「巨室大族爭相效尤,有嫁一女,而田產爲之蕩盡者。」¹¹⁸乾隆年間,陳宏謀的〈風俗條約〉批評蘇州嫁女奢侈風氣,「匳贈綵帛金珠,兩家羅列內外器物,既貴重又求精工。」故規定「嗣後富者聘幣不得過八端,匳箱不得過六隻。」¹¹⁹然而,昂貴的洋漆器皿仍爲蘇州女子必備嫁妝。蘇州的婚禮有所謂「送盤」,男家送盤中除聘金、禮金、釵環、紗緞外,有羹果、茶葉之類。女家答盤有書墨、筆硯、靴帽、袍套外,有糕果之類。因此,婚禮中必備洋漆方盒、盤、果盒、攢盒、都盛盤、提盒等盛裝禮品。在新房的桌上放一對「衣食飯碗」,飯碗裡除了盛米外,還要放桂圓、棗子、栗子及染成紅色的花生等。這一對飯碗又叫「和合碗」,日本輸出品中有洋漆蓋碗的項目。

王燧經營洋貨買賣,他的家產中有洋漆炕桌、洋漆几桌、洋漆香盒、洋漆蓋碗、洋漆都盛盤、洋漆茶盤、洋漆香盤、洋漆面扇盒、洋漆炕櫃、洋漆炕櫥、洋漆衣箱、洋漆描金櫥等,或許是賣給當地富家女子當嫁妝。蘇州婦女的嫁妝可以看到與清宮后妃公主的嫁妝很類似。《內務府現行則例》記載,公主下嫁外藩在京居住加添櫃箱,有黑漆描金櫃1對、黑漆描金大琴桌2張、黑漆描金小琴桌2張、黑漆描金椅子16張、黑漆描金皮箱桌18張、黑漆描金五屏風1個、黑漆描金簡粧1個、黑漆描金梳粧1個、黑漆描金矗燈2個、黑漆描金茶

¹¹⁷ 高濂著,《遵生八箋》,頁 486。

¹¹⁸ 相關研究參見林麗月,〈風俗與罪愆:明代的溺女記敘及其文化意涵〉,收入游鑑明主編,《無聲之聲(Ⅱ):近代中國的婦女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 1-24。

¹¹⁹ 陳宏謀,〈陳文恭公風俗條約〉,收入李銘皖等修、馮桂芬等纂,《蘇州府志》(台北:成文 出版社據光緒 9 年刊本,1970),卷 3,頁 149。

盤 4 個、黑漆描金痰盒 4 個、黑漆描金高火盆架 1 個、黑漆描金矮火盆架。¹²⁰ 如乾隆 10 年(1745)和碩公主下嫁,與乾隆皇子四阿哥福晉辦置妝奩,都有黑漆描金妝奩,以及硬木洋漆櫃箱、器皿等。¹²¹乾隆 35 年(1765)和靜固倫公主下嫁,其妝奩有:填漆大櫃 1 對、黑漆大櫃 1 對、黑漆書格 1 對、漆桌案大小34 張、填漆箱 8 個、紅漆大小皮箱 72 個、漆椅几 22 張、火盆架 40 件、填漆匣 16 個。¹²²公主的嫁妝透過專門的人拉抬,浩浩蕩蕩,結大隊而行,引人佇立而觀。

北京的宗室王公及達官貴人家,無不大講排場,家裡除去廚房外,一律擺設硬木家具,即紫壇、花梨木、螺鈿等。¹²³《紅樓夢》第3回提到的在炕「兩邊設一對梅花式洋漆小几,左邊几上擺著文王鼎,鼎旁匙箸盒,右邊几上擺著汝窯美人觚,裡面插著時鮮花草」,第53回提到:「榻上設一個輕巧洋漆描金小几,几上放着茶碗、漱盂、洋巾之類,又有一個眼鏡匣子。」¹²⁴謝明良研究清朝伊萬里瓷器,他說:「清人著述經常可見『倭刀』、『倭緞』等日本工藝品,也曾提及日本產瓷器,然似乎只有日本漆器(『洋漆』、『倭漆』)才引起清宮的興趣,甚且命造辦處油漆作進行仿製,而絕口不提日本陶瓷。」¹²⁵可見清朝風俗有編氓效品官,品官效宮廷的趨勢。

(四)其他

清人服飾中常見的「洋縐」,在東印度公司檔案和 *The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 一書,沒有這個名詞。¹²⁶而《吾妻鏡補》有兩段記載:「絲綢有粗細二

^{120 〈}內務府現行則例〉,掌儀司二。

i21 該家具製作經費用銀 1878.03 兩。〈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冊 214,乾隆 10 年 12 月 22 日; 冊 229,乾隆 19 年 4 月 11 日。

^{122 〈}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冊 298,乾隆 35 年 8 月 3 日。

¹²³ 愛新覺羅瀛生,《老北京與滿族》,頁 236-237。

¹²⁴ 曹雪芹、高鶚著、馮其庸校注,《紅樓夢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4),第 3 回,頁 50;第 53 回,頁 830。

S. Wells Williams, The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 Containing Treaties, Tariffs, Regulations, Tables, etc., Useful in the Trade to China & Eastern Asia: With an Appendix of Sailing Directions

種,總名曰洋綢。粗者如杭紡縷粗而光滑;細者而串綢不甚耐久」、「縐紗輕薄如蛛網,製爲蚊帳。圍之如拳,貯竹筒中張之無團縐痕,頗耐久,價值彼處 色銀三、四十兩。」¹²⁷造辦處的收貯清冊記載洋倭緞,亦爲日本進口的綢緞。

《吾妻鏡補》載:「紙俱棉料,有五色彩箋,其花文凡山水人物之類,皆極精巧。」¹²⁸《唐船輸出入品數量一覽》多處記載進口和紙,如乾隆 10 年南京船輸入書籍用和紙 1,800 連。¹²⁹五色彩箋相當精緻,內務府廣儲司藏各色倭子紙 10,000 張。¹³⁰造辦處每年的收貯清冊亦記載有東洋紙、日本紙、西洋紙,爲江南三織造局、粵海關等衙門年例進貢。¹³¹

雍正年間乍浦每年關稅額徵 39,000 兩,額徵外報收盈餘銀爲 54,000 餘兩,而糖及局商所帶洋貨佔稅額的 20%。¹³²乍浦水路輻湊、百貨交集,額徵稅與盈餘銀將近十萬兩,洋貨撥至蘇州發賣,影響了市民生活。《姑蘇竹枝詞》載:「推算商船滸墅關,多錢關吏日常閒。給衣摺扇童擔榼,合隊遊春上管山。」¹³³蘇州人製作摺扇,即自宋代以來日本輸入摺扇,在汴京相國寺販賣日本的畫扇。¹³⁴試想,有錢的稅關官吏拿著日本的摺扇,童僕挑著提盒蒔繪,吃著魚翅、海參的海產,不就風俗近瀛洲?

四、從東洋風看清代的文化認同

陳慧霞認爲清宮使用蒔繪的風氣,並非承襲明代宮廷,而是受到晚明江南

for Those Seas and Coasts (Taipei: Ch'eng-Wen Publishing, 1966), pp. 105-106.

¹²⁷ 翁廣平著,王寶平編,《吾妻鏡補》,卷 16,頁 324。

¹²⁶ 翁廣平著,王寶平編,《吾妻鏡補》,卷 16,頁 320。

¹²⁹ 永積洋子編,《唐船輸出入品数量一覧,1637-1833 年》,頁 259。

^{130 《}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微捲第 103 盒,乾隆 22 年 12 月雜錄。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48,頁 253,乾隆 50 年 3 月行文。乾隆 50 年「二十六日庫掌大達色催長金江舒興來說太監鄂魯里傳旨:著傳與三處織造,年例呈進倭子紙,不必呈進,俟傳時再進,欽此。」

¹³² 許河,《乍浦備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 20》,卷 6,頁 147-148。

¹³³ 袁學瀾輯,《姑蘇竹枝詞及續》,收入《中國風十志叢刊》,冊43,卷5,頁76。

¹³⁴ 王勇,《中国史のなかの日本像》(東京:農山漁村文化協會,2000),頁 104-106。

文化圈的影響。¹³⁵對此觀點,我想進一步論述。日本蒔繪是十六世紀末江南文化圈日常生活經常使用的器具。明人對日本稱呼爲「倭」,文人對「倭」製的器物非常讚賞。《長物志》提到「倭製」的器物,有「(櫥)日本所製,皆奇品也」;「(佛廚、佛桌)有日本製者,俱自然古雅」;「倭箱黑漆嵌金銀片,大者盈尺,其鉸釘鎖鑰,俱奇巧絕倫」;「摺疊扇,古稱聚頭扇,乃日本所進,彼國今尚有絕佳者」;「(鑄劍)近時莫如倭奴昕鑄,青光射人」;¹³⁶《廣東新語》載:「有石竹,大者徑三寸,質實微空最堅。老者斧斤不能入,倭刀觸之立斷。」¹³⁷《遵生八箋》亦提及各種倭漆、倭銅器。

然而,清朝以異族統治中國,對文字上忌諱「倭」、「寇」之類,對日本改稱「日本」、「東洋」。如《清高宗實錄》載:「銅觔之產於東洋者。」¹³⁸ 乾隆皇帝積極建立滿洲民族意識,如加強滿洲人修族譜、編修滿人祭祀典禮、漢人出旗等,企圖劃清八旗滿洲與漢族的界限。¹³⁹乾隆皇帝強化滿洲的族群認同時,漢人逐漸習染滿洲文化,《姑蘇竹枝詞》載:「閨中學作滿洲裝,圓領帔山帕一方。口吸筠筩香霧噴,濃粧向晚立門旁。」¹⁴⁰清初實施剃髮令,強迫漢人易衣冠髮飾,但僅限於男性,女性仍服漢裝。清中期,蘇州婦女學作滿洲裝,可見江南人已經認同滿洲統治。本節將討論蘇州織造局製作器物以及日本輸入的漆器,來瞭解宮廷主導的文化如何成爲蘇州流行時尚。

(一)蘇州織造局工匠

根據陳慧霞的研究,明清工匠仿製蒔繪有兩個問題:第一是胎厚,蒔繪質 輕如紙,仿洋漆盒則「蠢些」。第二是灑金,蒔繪用碎金入漆,顆屑園稜分明,

¹³⁵ 陳慧霞、〈清宮舊藏日本蒔繪的若干問題——以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收藏爲中心〉、《故宮學術季刊》, 卷 20 期 4 , 頁 196。

¹³⁶ 文震亨著,海軍、田君注釋,《長物志圖說》,卷 7,頁 278、281、283、351、371。

¹³⁷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 27,頁 683。

¹³⁸ 覺羅勒德洪等奉敕修,《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227,頁942-1。

參見 Pamela K.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p. 281-336.

¹⁴⁰ 袁學瀾輯,《姑蘇竹枝詞及續》,收入《中國風土志叢刊》,冊 43,卷 5,頁 42。

仿洋漆用飛金片點,編薄模糊。如雍正 7 年(1729)造辦處仿製洋漆盒,說盒內灑金與蒔繪略不像。¹⁴¹

乾隆年間,蘇州漆工所做雕漆,從器皿、陳設、文具、供器到家俱,品種齊全,應有盡有。¹⁴²在檔案上稱爲「蘇漆」,與洋漆有別。¹⁴³透過中日貿易關係,日本進口的洋漆器漸多,蘇州織造局似乎未生產洋漆器物,而修理方面則有些紀錄。乾隆 40 年(1775),「太監鄂魯里交金洋漆長方箱一對,每件屜一層銀十件。黑洋漆描金長方箱一對,每件蠟一層,銅十件。黑洋漆描金大箱一對,無屜銅十件。黑洋漆箱一件,無屜銅十件。俱內殿傳旨:著將造辦處現收貯百什件古玩玉器等,挑選在箱內配屜,安裝併將大箱漆邊有不齊金處收拾,欽此。」¹⁴⁴乾隆 46 年,「油木作副催長保恩接辦由內交出螺甸大漆盒,內盛小雕舊漆盒九件。于承接之時失手脫落,灰頭漆水脫落數塊,盒身間有損冽,京中匠役不能收拾,相應奏聞將小舊漆盒三件,發交蘇州織造至德照舊漆顏色花樣,將損壞處收拾妥協。」皇帝說:「保恩不小心承接,致將漆盒傷損三件,寔屬荒唐糊塗」,¹⁴⁵罰他重新辦理,支付所有收拾漆盒用過工料銀兩,並罰錢糧六個月以示懲戒。

陳慧霞認為:「洋漆不僅代表從日本輸入的蒔繪,同時更廣泛的指一種風格。」¹⁴⁶在蘇州織造局成做的器物中,的確顯示「洋漆」風格。乾隆 32 年(1767),皇帝交代蘇州織造局成做洋漆圍棋簍的象牙象棋 1 份、青白玉、玻璃圍棋棋子各 180 個、象棋 16 個。¹⁴⁷(圖 13)

¹⁴¹ 陳慧霞、〈清宮舊藏日本蒔繪的若干問題——以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收藏爲中心〉、《故宮學術季刊》, 卷 20 期 4 , 頁 209-210。

¹⁴² 參見楊伯達,〈清代蘇州雕漆始末——從清宮造辦處檔案看清代蘇州雕漆〉,《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期 4 (1982),頁 123-127、136。

¹⁴³ 如閩浙總督陳輝祖家產中有「蘇漆炕几一對」,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冊 3,頁 2500。

^{144《}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微捲第 154 盒,乾隆 61 年 11 月匣錶作。

¹⁴⁵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44,頁 15。

¹⁴⁶ 陳慧霞,〈清宮舊藏日本蒔繪的若干問題——以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收藏爲中心〉,《故宮學術季刊》, 卷 20 期 4 , 頁 195。

^{147 《}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微捲第117盒,乾隆32年10、11月行文;第118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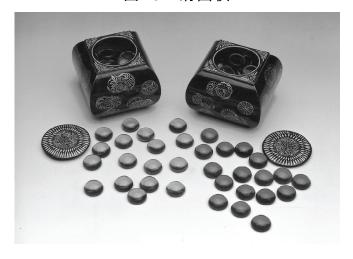


圖 13 清圍棋

資料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收入中華民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國立故宮博物院 文房聚英》(京都:同朋舍,1993),頁172。

乾隆 48 年記載:「四月二十三日,將紅漆金龍箱一件,內盛各式黑墨一百錠,配得糊錦屜洋漆長方箱一對。內盛主式紅墨二十錠,回氏紅墨六十錠。配得糊錦屜洋漆長方箱一對,內盛百子圖黑墨六十錠。配得糊錦屜黑洋漆金花抽屜箱二件,內盛各式黑墨一百錠。配得糊錦屜洋漆長方匣一件,內盛紅墨四十錠。」乾隆 61 年〔即嘉慶元年(1796)〕,養心殿搭蓋天地香亭洋漆戲臺,通共約需工飯買辦銀 1,495.93 兩,紅飛金 94,853 張。¹⁴⁸洋漆的風格是否爲漆上貼金箔,這可能還需進一步研究。嘉慶 2 年(1797),「做鐘處將應行補做乾清宮陳設洋漆格鐘一架。其五彩琺瑯表盤,交粤海關監督常福照樣成做,洋漆格子交蘇州織造舒璽照樣成做。」¹⁴⁹

陳慧霞認爲日本在十八世紀外銷中國的蒔繪中,存在一批特別精緻的作

乾隆 32 年 12 月如意館。

¹⁴⁸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47,頁 561-564,乾隆 49 年 5 月油木作。

^{49 《}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微捲第 154 盒,乾隆 61 年 12 月;乾隆 62 年。

品,在風格和技法上都和日本國內製品的發展一致。此與外銷歐洲的蒔繪出現南蠻風格、紅毛風格不同。¹⁵⁰我們從活計檔中看到乾隆皇帝批評西洋的器物不好看,要求蘇州工匠模仿去「西洋氣」。然而,乾隆皇帝對日本的洋漆卻不排斥。乾隆 41 年,太監將一面玻璃螺甸漆鐘架一座(萬壽山)、二面玻璃螺甸漆鐘架一座(圓明園)發往蘇州,皇帝交代:「將螺甸刮去,用舊胎股另漆黑漆畫金花,要仿洋漆作法。」¹⁵¹故宮博物院藏「黑漆描金亭式鐘」爲仿日本廟宇的鐘殼,外飾髹金洋漆亦仿自日本工藝。琺瑯鐘盤上有「乾隆年製」。



圖 14 仿日本廟宇的鐘殼

資料來源:劉潞主編,《清宮西洋儀器》,收入《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香港: 商務印書館,1998),卷58,頁235。

¹⁵⁰ 陳慧霞,〈清宮舊藏日本蒔繪的若干問題——以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收藏爲中心〉,《故宮學術季刊》,卷 20 期 4,頁 191-223。

^{151 《}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微捲第131 盒,乾隆 41 年 2 月行文。

(二) 文化認同

過去有學者提及乾隆皇帝對洋貨不感興趣,且認爲西方生產的物品是淫巧奇器。如 Harold Kahn (康無爲)曾提到:「十八世紀的北京在生活方式或服飾上,並未模仿外人,也沒做過什麼調適,不像八世紀長安那樣,深受唐帝國外緣的突厥和波斯人的風格與貨物的影響。」¹⁵²實際上,皇帝吃的燕窩、穿的毛皮、金線織的龍袍、用蒔繪、洋琺瑯等等,皆是舶來品。《孟子·滕文公上》說:「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皇帝的喜好影響了蘇州等地區,流行擺飾自鳴鐘、戴手錶、穿皮裘的時尚,都可看出蘇州奢侈的風氣。錢泳《履園叢話》提及:「高宗皇帝六次南巡,江、浙各處名勝俱造行宮,俱列陳設,所雕象牙紫檀花梨屏座,並銅磁玉器架墊,有龍鳳水雲漢紋雷紋洋花洋蓮之奇,至每件有費千百工者,自此雕工日益盛云。」¹⁵³由於皇帝南巡,各地官員爭相蓋行宮、擺陳設,使江南的工匠技藝日益精進。

從江南官員抄家檔案中看到各種洋漆器物,包括炕櫃、炕櫥、炕桌、炕屏、炕圍,以及炕毯、炕墊、炕坐褥、炕椅墊。清朝臥室擺設的炕几,是沿襲滿洲習俗。吳振臣《寧古塔紀略》載:「多間寒氣侵入,視之如霜,屋內南西北接繞三炕,炕上用蘆席,席上鋪大紅氈。炕闊六尺,每一面長二丈五六尺。夜則橫臥炕上,必並頭而臥,即出外亦然。櫥、箱、被褥之類,俱靠西北牆安放。有南、西窗,門在南灶之旁,窗戶俱從外閉,恐夜間虎來,易於撞進。靠東邊間,以板壁隔斷,有南北二炕,有南窗,即爲內房矣。無椅杌,有炕桌,俱盤膝坐。客來俱坐南炕,內眷不避。」¹⁵⁴

清宮冬天的地面下砌火道,由設在殿外廊下的灶口處添炭火,稱爲暖閣。 滿洲人來自寒冷的關外,傳統住家都砌炕床。明代所謂的「倭几」、「倭櫥」 都變成炕几、炕櫥,官員家產中洋漆器物以「炕」命名者居半。炕在清代的官

¹⁵² 康無爲(Harold Kahn),〈帝王品味:乾隆朝的宏偉氣象與異國奇珍〉,收入《讀史偶得:學術演講三篇》(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頁 70。

³³³ 錢泳,《履園叢話》,頁 324。

¹⁵⁴ 吳振臣,《寧古塔紀略》,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北京圖書館藏清 抄本影印,1997),史部,地理類,冊 731,頁 610。

書、文集,以及小說《紅樓夢》、《兒女英雄傳》中大量出現,飲食和起居活動以炕爲中心,可以說是滿洲人特有的文化產物。滿族人祭神後吃祭肉就是在炕上鋪榻而坐,不設桌几椅凳。¹⁵⁵許多官員到南方當官家裡仍使用炕,《廣東新語》載:「比年嶺表甚寒,雖無雪霜,而凜烈慘悽之氣,在冬末春初殊甚。北人至此,多有衣重裘坐臥火炕者,蓋地氣隨人而轉。北人今多在南,故嶺表因之生寒也。」¹⁵⁶廣東雖寒冬低溫日數不多,而北方官員到廣東仍築炕而居。

洋漆用於宮廷建築,以重華宮翠雲館內檐裝修最爲著名。傳教士蔣友仁 (Michel Benoist, 1715-1774)提到,乾隆皇帝住的房間裡有一處由各色細木拱架 圍成的凹室,凹室中嵌放著上了日本罩光漆的一級級的擱板,上面擺滿了珍貴器皿和各種首飾。¹⁵⁷翠雲館面闊 5 間,進深 1 間,黄琉璃瓦硬山頂,明間開門,餘皆爲檻窗。殿内描金漆金線如意燈籠錦隔心山水條環板裙板隔扇黑漆描金裝修,從裝飾紋看來應該是來自日本的蒔繪(參見圖 15)。¹⁵⁸

朱家溍先生認爲:「『清代養心殿造辦處』檔案所記載的『洋漆』,就是指在黑漆和朱漆或其他單色漆上『描金』(按:一名泥金畫漆)、『泥金』、『灑金』,以及描金加彩的器物。可能當時在工匠們的口語中和市場習慣上認爲『描金』、『灑金』之法來自東洋,所以用個『洋』字。」¹⁵⁹建福宮的描金漆花鳥絛環板裙板隔扇,金漆胎薄有皸裂痕跡,應該是內廷仿做。¹⁶⁰傳教士晁俊秀(François Bourgeois, 1723-1792)批評中國人非常善於模仿,但缺少一點靈

ISS 關於火炕的研究,參見黃錫惠、王岸英,〈滿族火炕考辨〉,《黑龍江民族叢刊》,2002年第4期,頁87-89。該文指出滿洲以西爲尊、南次之,北爲卑。火炕以西炕爲貴,祖宗板供在西墙上。但有些地方也不盡然如此,譬如《郎潛紀聞四筆》載,夕祭設幪架於北炕。陳康祺,《郎潛紀聞四筆》(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6,頁97。

¹⁵⁶ 屈大均,《廣東新語》, 卷 1, 頁 14。

[〔]法〕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編,呂一民等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 (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卷 6,頁 22。

¹⁵⁸ 翠雲館描金隔扇,見故宮博物院古建築管理部編,《故宮建築內檐裝修》(北京:紫禁城出版 社,2007),頁132-133。

^{\$\}frac{159}{\$\frac{1}{8}}\$\$ 朱家溍,〈清代漆器概述〉,收入中國漆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朱家溍、夏更起主編,《中國漆器全集》(福建:福建美術出版社,1993),卷 6,頁 5。

¹⁶⁰ 建福宮描金隔扇,參見故宮博物院古建築管理部編,《故宮建築內檐裝修》,頁 135。

氣。¹⁶¹從日本與北京工匠製作兩處描金隔扇看來,的確是如此(圖 16)。

圖 15 翠雲館描金隔扇



圖 16 建福宮描金隔扇



資料來源:故宮博物院古建築管理部編,《故宮建築內檐裝修》,頁133、135。

五、結 論

近年來,學者柯律格(Craig Clunas)、卜正民(Timothy Brook)、巫仁恕等討論晚明消費文化,認爲晚明是由士大夫引導流行時尚,然而清代士大夫在創造時尚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已大不如前,取而代之的是北京的宮廷領導流行,尤以

[[]法]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編,呂一民等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卷 5,頁 127。

十八世紀的乾隆朝爲然。¹⁶²本文利用中國輸入東洋物資的資料來討論十八世紀中日貿易,發現對蘇州市民日常生活的影響約有四端,並可概分爲兩個層面:其一是來自日本器物本身的影響;其二則是來自清代統治階層的影響。

第一,康雍乾時代使用銅錢的原料乃是由日本進口洋銅,至十八世紀中葉後,洋銅數量減少,而海產品數量增加。自清代江南的食譜記載,可以瞭解海產品、醬油、味噌、酒等進口東洋食品已改變了市民的飲食習慣。陳作霖《炳燭里談》提到:「道光年間,凡物之極貴重者,皆謂之洋。火鍋名爲洋鍋,細而至於醬油之佳者亦呼洋秋油。大江南北莫不以洋爲尚。」¹⁶³至二十世紀初,日人內藤湖南到蘇州感覺「南音近於我之吳音」,青木正兒也說:「經過了上海、蘇州的我,好像從大阪回到京都一樣感到安心和熟悉」,¹⁶⁴顯然他們都感覺到蘇州生活與日本相近之處。

第二,明代文人喜愛的倭器,到了清代,種類、用途更爲普遍。除了文人書房用具之外,還增添廚具和臥室中的洋漆茶几、茶盤、洋漆櫃,乃至婦女梳妝台等。清朝旗人婦女地位高,公主下嫁時有成套的漆器妝奩。陳宏謀〈風俗條約〉第一則批評蘇州嫁女奢侈風氣「匳贈綵帛金珠,既貴重又求精工」,可見蘇州流行豐厚嫁妝是受到京城風氣影響。巫仁恕認爲明清婦女史與消費文化關係,在過去較被忽視,他曾討論過婦女的服飾,現階段本文則由婦女的妝奩方面著手探討,將來或可再爬梳更多資料來討論婦女的消費問題。

第三,明代是由文人帶領時尚的流行,到了清代,隨著皇帝的包衣官員在 蘇州織造局生產器皿、皇帝數次下江南、官員揣摩上意採購買品,工匠乃日以 繼夜生產陳設器物,導致皇帝的喜好影響民間。本文嘗試解釋北京和國立故宮 博物院所藏日本洋漆器的來源,但因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目前沒開放進買 單的檔案,故而只能從官員抄家檔案來討論。又因民間的洋漆家具大都無存,

-40-

^{.&}lt;sup>02</sup> 巫仁恕,〈明清消費文化研究的新取徑與新問題〉,《新史學》,卷 17 期 4(2006),頁 217-254。

¹⁶³ 陳作霖,《炳燭里談》轉引自來新夏,《清人筆記隨錄》(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460。

¹⁶⁴ 內藤湖南、青木正兒著,王青譯,《兩個日本漢學家的中國紀行》(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頁89、110。

所以本文以清代宮廷洋漆家具典藏品爲考察對象,並歸納出市民模仿上流社會 的趨勢。乾隆皇帝刻意叫工匠製作仿西洋的物品時「去西洋氣」,來區隔「中 國」和「西洋」。然而,皇帝對日本的器物卻十分喜愛,連帶也就促使洋漆成 爲日本漆器風格的代名詞。從室內擺設的時鐘、內檐裝潢隔扇,以及皇帝看戲 的戲臺都使用洋漆等,日本風格的洋漆受皇帝喜愛的程度,可見一斑。

第四,清朝入關前從事的貿易活動,主要爲販賣毛皮、人參等,此因東北關外天氣寒冷,滿洲人特別注重冬天保暖。而這樣的風氣日後也逐漸及於江南地區,蘇州不但毛皮服飾充斥,家庭保暖設備齊全,甚至使用進口的銅火鍋、銅火爐,平常個人還可使用銅手爐、腳爐,足以舒適地度過寒冬。

乾隆皇帝的佛裝像藏於西藏、蒙古及北京寺廟,代表他爲藏傳佛教世系傳承中的轉輪王,並藉此向蒙藏民眾示顯他就是人間的「佛祖」。而在漢人社會,則是藉由皇帝南巡或官員辦貢,將聖君形象以及宮廷文化推展到民間,室內裝潢、家具和碟盤器用或許正是推展宮廷禮儀的方式之一。

附錄一 日本進口的銅器

年代	古玩器物和數量	日用器皿
1743	真鍮器物10箱	銅藥罐2,900斤
1745		銅藥罐
1749	古銅器物11,400斤、又9箱	
1750	真鍮器物3箱、銅器物15箱、古銅器物6	銅藥罐132個、銅風爐和銅盥共8
	箱	個
1751	古銅器物8箱、銅器物19箱	
1756	銅器物36箱	
1757	真鍮器物小箱、銅器物85箱	銅藥罐和銅盥共7箱
1759	銅器物	
1760	銅器物6箱、真鍮器物4箱	銅盥7箱、銅藥罐3箱
1761	銅器物10箱	銅藥罐1箱、銅鍋1箱
1762	真鍮器物	銅盥2箱、銅藥罐1箱
1763	真鍮器物4箱、銅器物96斤叉19箱	銅盥8箱又4組、銅藥罐647個又5
		箱、銅火鉢7個、小風爐29個、小
		鍋5包、銅鍋5箱5包6個又1.5斤
1764	真鍮器物若干、銅器物320.5斤又15箱	銅藥罐20箱、銅鍋2箱8個又2袋、
		銅盥39個又4箱、銅火鉢1個、銅
		風爐29個、銅斧1箱又16個
1765	真鍮器物96.89斤、銅器物1,506.39斤又	銅藥罐15箱、銅鍋28箱5組、銅盥
	296個、28箱	5組、銅火燭20本
1766	銅器物467.5斤、11箱	銅藥罐18斤、銅盥、銅風爐2斤
1767	真鍮器物1箱又若干、銅器物5箱	銅藥罐29箱、銅鍋12箱6袋、銅盥
		10組11箱、銅火鉢2個
1768	真鍮器物若干、銅器物20箱又與漆器75	銅藥罐3箱、銅鍋3箱、銅盥7箱、
	斤	銅茶道具5組
1769	真鍮器物若干、銅器物126斤	銅藥罐6樽26箱又14組、銅鍋2樽
		14箱又11組、銅盥27箱、銅火缽2
		箱9個

資料來源:永積洋子,《唐船輸出入品数量一覧,1637-1833年:復元唐船貨物改帳,帰帆荷物買渡帳》(東京:創文社,1987)。

徵引書目

一、史料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現存清代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藏。
- 〈內務府現行則例〉,掌儀司二。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抄本。
- 〈內務府銀庫用項月摺檔〉。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 〈內務府廣儲司用款檔〉,冊1673。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 〈乾隆四十八年正月膳底檔〉,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檔案史料:圓明園》。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冊 214、229、281、298。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 《宮中硃批奏摺》,財政類,庫儲。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發行微捲,1987。
- 《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微捲第 103、117、118、123、131、151、154 盒。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發行微捲, 2000。
- 〔法〕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編,呂一民等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 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39、47、 48。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冊1-4。北京:中華書局,1994。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宮御膳》,冊1。杭州:華寶齋書社,2001。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冊23。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1991。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上冊。合肥:黃山書社,1998。
- 內藤湖南、青木正兒著,王青譯,《兩個日本漢學家的中國紀行》。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
- 文震亨著,海軍、田君注釋,《長物志圖說》。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 王稼句,《姑蘇食話》。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4。
- 朱彝尊撰,邱龐同注釋,《食憲鴻秘》。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85。
- 佚 名,《調鼎集》。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86。
- 吳秀之等修,《吳縣志》,卷50、52。台北:成文出版社據民國22年鉛字本影印,1970。
- 吳振臣,《寧古塔紀略》,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冊 73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據北京圖書館藏清抄本影印,1997。
- 李漁著,江巨榮、盧壽榮校注,《閒情偶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屈大均,《廣東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7。
- 約翰·巴羅著,李國慶、歐陽少春譯,《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

徐 珂,《清稗類鈔》,冊4、5、7。北京:中華書局,1984。

袁枚著,王英中校點,《隨園食單》。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袁學瀾輯,《吳俗諷喻詩》,收入《中國風土志叢刊》,冊 35。揚州:廣陵書社據清香溪草堂《適 園叢稿》本影印,2003。

袁學瀾輯,《姑蘇竹枝詞及續》,收入《中國風土志叢刊》,冊 43。揚州:廣陵書社據清香溪草堂《適園叢稿》本影印,2003。

高 濂,《遵生八箋》。成都:巴蜀書社,1988。

曹雪芹、高鶚著,馮其庸校注,《紅樓夢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4。

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獻通考》,卷 14,16,17。台北:台灣商務書局據清光緒間浙江刊本縮印, 1987。

許 河,《乍浦備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 20》,卷 6。上海:上海書店,1992。 陳宏謀,〈申銅禁酌鼓鑄疏〉,收入賀長齡輯,《皇朝經世文編》,卷 53。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9。

陳宏謀,〈陳文恭公風俗條約〉,收入李銘皖等修、馮桂芬等纂,《蘇州府志》,卷 3。台北:成 文出版社據光緒 9 年刊本,1970。

陳其元,《庸閒齋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89。

陳康祺,《郎潛紀聞四筆》。北京:中華書局,1990。

陸以湉,《冷廬雜識》。北京:中華書局,1997。

葉長揚、姜順蛟纂,乾隆《吳縣志》,卷24。乾隆10年刊本,蘇州圖書館藏。

歐陽兆熊、金安清撰,《水窗春囈》,下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

錢 泳,《履園叢話》。北京:中華書局,1979。

蘇州歷史博物館、江蘇師範學院歷史系、南京大學明清史研究室合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 蘇州:江蘇人民出版計,1981。

覺羅勒德洪等奉敕修,《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227、1167。北京:中華書局,1986。

顧 祿,《清嘉錄》,卷1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顧祿撰,王稼句點校,《桐橋倚棹錄》,收入《蘇州文獻叢鈔初編》,下冊。蘇州:古吳軒出版社, 2005。

龔 煒,《巢林筆談》。北京:中華書局,1981。

翁廣平著,王寶平編,《吾妻鏡補:中国人による最初の日本通史》,卷 15-16。京都:朋友書店, 1997。

二、專書

中華民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國立故宮博物院文房聚英》。京都:同朋舍,1993。

巫仁恕,《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

李玉珉主編,《古色:十六至十八世紀藝術的仿古風》。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3。

來新夏,《清人筆記隨錄》。北京:中華書局,2005。

故宮博物院古建築管理部編,《故宮建築內檐裝修》。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7。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藏日本文物展覽圖錄》。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

段本洛、張圻福,《蘇州手工業史》。蘇州: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

范金民編,《江南社會經濟研究(明清卷)》。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6。

康無爲(Harold Kahn),《讀史偶得:學術演講三篇》。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陳慧霞,《清宮蒔繪:院藏日本漆器特展》。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2。

華潤齡,《吳門醫派》。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4。

愛新覺羅瀛生,《老北京與滿族》。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

劉潞主編,《清宮西洋儀器》,收入《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卷 58。香港:商務印書館, 1998。

蔡利民,《蘇州民俗》。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

諾貝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著,王佩莉譯,《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 卷1、2。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局,1998。

永積洋子編,《唐船輸出入品数量一覧,1637-1833 年:復元唐船貨物改帳•帰帆荷物買渡帳》。 東京:創文社,1987。

王勇,《中国史のなかの日本像》。東京:農山漁村文化協會,2000。

山脇悌二郎、《長崎の唐人貿易》。東京:吉川弘文館、1960。

松浦章,《清代海外貿易史の研究》。京都:朋友書店,2002。

任鴻章,《近世日本と日中貿易》。東京:六興出版,1988。

Crossley, Pamela K.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Williams, S. Wells. The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 Containing Treaties, Tariffs, Regulations, Tables, etc., Useful in the Trade to China & Eastern Asi: With an Appendix of Sailing Directions for Those Seas and Coasts. Taipei: Ch'eng-Wen Publishing, 1966.

三、論文

王家範,〈明清江南消費性質與消費效果解析——明清江南消費經濟探測之二〉,《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988年第2期,頁157-167。

王家範,〈明清江南消費風氣與消費結構描述——明清江南消費經濟探測之一〉,《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2期,頁32-42。

朱家溍,〈清代漆器概述〉,收入中國漆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朱家溍、夏更起主編,《中國漆器全集》,卷 6。福建:福建美術出版社,1993。

巫仁恕,〈明清消費文化研究的新取徑與新問題〉,《新史學》,卷 17 期 4,2006,頁 217-254。 林麗月,〈風俗與罪愆:明代的溺女記敘及其文化意涵〉,收入游鑑明主編,《無聲之聲(Π):近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三期

代中國的婦女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

- 許雅惠,〈晚明的古銅知識與仿古銅器〉,《故宮文物月刊》,期 250,2004 年 1 月,頁 53-63。
- 郭忠豪,〈食物製作與品饌文化——萬曆—乾隆間江南的飲食生活〉。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 史學系碩士論文,2004。
- 陳慧霞、〈清宮舊藏日本蒔繪的若干問題——以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收藏爲中心〉、《故宮學術季刊》、 卷 20 期 4,2003,頁 191-223。
- 黄錫惠、王岸英、〈滿族火炕考辨〉、《黑龍江民族叢刊》、2002年第4期、頁87-89。
- 楊伯達,〈清代蘇州雕漆始末——從清宮造辦處檔案看清代蘇州雕漆〉,《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 總期 4,1982,頁 123-138。
- 劉序楓,〈財稅與貿易:日本「鎖國」期間中日商品交易之展開〉,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社會經濟史組編,《財政與近代歷史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
- 劉序楓,〈清代的乍浦港與中日貿易〉,收入張彬村、劉石吉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 5 輯。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3。
- 劉序楓,〈清康熙——乾隆年間洋銅的進口與流通問題〉,收入湯熙勇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7輯。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9。
- 賴惠敏,〈北京的洋貨與旗人日常生活(1736-179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從城市看中國的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2007年6月28日。出版中。
- 賴惠敏, 〈清乾隆朝內務府的皮貨買賣與京城時尚〉, 《故宮學術季刊》, 卷 21 期 1, 2003, 頁 101-134。
- 賴惠敏,〈寡人好貨:乾隆帝與姑蘇繁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50,2005 年 12 月,頁 185-233。
- 賴毓芝,〈從康熙的算學到奧地利安布列斯堡收藏的一些思考〉,《故宮文物月刊》,期 276,2006 年 3 月,頁 106-118。
- 謝明良,〈記故宮博物院所藏的伊萬里瓷器〉,《故宮學術季刊》,卷 14 期 3,1997,頁 83-128。
- 劉序楓,〈清日貿易の洋銅商にいて——乾隆~咸豊期の官商・民商を中心に-〉,《九州大学東 洋史論集》,號 15,1986,頁 107-152。

四、口述訪問紀錄

賴惠敏訪問,〈林瑞星先生口述紀錄〉,2008年2月13日。

Japanese Products and Everyday Life in Suzhou, 1736-1795

Lai Hui-min*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sources for the import of Japanese goods into China in order to discuss Sino-Japanese trade in Suzhou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d how people in Suzhou consumed Japanese commodities. The ways that Suzhou residents consumed these commodities were influenced not only by the quality of Japanese goods but also by the ruling culture of the Qing dynasty. With the increase of populatio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hina began to import copper from Japan in order to mint coins. After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 copper imports were outpaced by ocean products from Japan. Analysis of cook books from southern regions of China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shows that ocean products, soy sauce, miso, and wines had changed dining habits in China.

Japanese wares, already favored by Ming literati, came in wider us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ey were commonly found in kitchens and bedchambers; commonly used imports included lacquer tea tables, tea plates, lacquer cabinets, and wash table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it was the literati who determined what was fashionable; with the advent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role of fashion leader shifted to the royal family. The taste of the emperors deeply influenced that of commoners. The kinds of vessels produced by the Suzhou Production Bureau, as well as the gifts chosen by officials for the emperors, all reveal the tastes of the royal family. The dining ware popular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shows how ordinary people imitated their superiors. As for the emperors themselves, the Qianlong Emperor usually gave orders to the artisans that, when imitating Western

_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style artifacts, they should somehow eliminate the "western-ness" of those artifacts and make a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Japanese artifacts, however, suffered from no such limitations and were much favored by the Qianlong Emperor. During his reign, foreign lacquer (yangqi) was not only a name of a particular product but also representated Japanese-style lacquerware in general. The influence of Manchu culture can also be seen in how people of Suzhou adapted to the winter season. Furs were commonly found in Suzhou markets during cold periods; people also used heating equipment imported from Japan.

In sum, this article shows how the diet, daily utensils, and social customs changed with the import of Japanese commodities. The gradual assimilation of Japanese goods shows how Qing royal culture influenced common citizens and how citizens imitated this royal culture.

Keywords: Suzhou, Japanese products, copper, maki-e, cultural identity